

# 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 目錄

- 一 開場白……………四五一
- 二 記少年中國學會……………四五三  
（一個與現代中國有密切關係的青年團體）  
447
- 三 自『五四』以來……………四六一  
（中國進入了一個動盪不寧的時代）
- 四 『五四』以後的中國出版界和教育界……………四七一  
（附帶敘述我一點法遊觀感）

- 五 『九一八』以後……………四八三  
 (這一節包括幾個有名人物的故事)
- 六 抗日準備時期……………四九三  
 (附帶記錄了我二十五年東遊的感想)
- 七 抗戰的第一階段……………五〇五  
 (這裡記錄了我當時在南京和武漢的見聞)
- 八 留在四川的八年……………五一五
- 九 記「民主政團同盟」與延安之遊……………五二九  
 (這裡敘述了我與若干中共首腦人物的會見)
- 十 勝利以後……………五四五  
 (我所見國共最後破裂的一幕)

我眼中的中國農林事業……………五五九

(略記我從事農林行政的一點經驗)

十二 結論……………五七一

附錄 清民之際的長沙……………五七三

(「近三十年見聞雜記」的一個補篇，記述我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經歷)



# 一 開場白

從民國八年的「五四」，到三十八年由大陸退出，剛好是三十年。

這個短短的三十年，正是我由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投身社會，以迄今日的全部時間。

在這三十年中，消磨我時間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其次四川，其次南京，其次巴黎，其次武漢，其次香港，又其次是前年四個月的臺灣。

其餘因短期旅行而足跡所到之處，在國內的北方有青島，濟南，天津，北平，石家莊，太原，大同，延安，以及鄭州，徐州；在南方則江浙兩省的遊蹤較多，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的若干地點，我也到過。但西南一隅，我不會到過康，滇，黔，桂；西北不會到過甘，寧，青，新；正北一面，不會去過熱，察，綏；東北一角，則未出山海關一步。國外旅行過的地方更少，除西貢，新加坡，可倫坡，波峇因路過會登岸遊覽以外，僅日本有過兩星期的

勾留，也是我生平旅行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

我的出生地是湖南長沙，但我很慚愧，除長沙以外，湖南的任何地方我也不會去過。當我二十歲的那年，便已永別了我的故鄉，中間僅回去過兩次：第一次爲我的父母討了一個媳婦；第二次則因出國，送我的太太暫回娘家。在抗日初期，因爲政治中心移到了武漢，其時我任了國防參議會的一名參議員，隨後又參加了國民參政會。以湘鄂的交通方便，又會回長沙兩次，看見我童年時期的幾個同學，幾位本家和親戚。其時我已父母雙亡，一個簡單的家庭，留在淪陷的上海，兩個較大的兒子投入了空軍，當我離開武漢飛往重慶的時候，我是逍遙自在的孑然一身，也是我生平精神上最振奮最愉快的一個時代。

依據上面的敘述，可見我活動的空間甚爲有限，至於我個人這三十年的經歷，概括言之，不過是十年的編輯員，十年的教書匠，最後更混了十年的所謂政治生活。如果只就我個人身上取材，我這個幾萬字的雜記可能毫無精采，可是我紀載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了這三十年一切的見聞聞，却大可喚起大家一些有趣的回憶，因爲手邊缺少參考資料，一切內容，全憑記憶，關於某一事件發生的時間，容或偶有錯誤，但真實性却可相當保證，假如賜閱這個雜記的讀者，發現有不對的地方，而肯加以指正，我當然非常感謝。

## 二 記少年中國學會

(一個與現代中國政治有密切關係的青年團體)

在最近這三十年中，我曾加入並且還賣過相當氣力的團體，一共只有三個：一、少年中國學會，二、中國青年黨，三、民主政團同盟。這三個團體是一貫相生的，換言之，無學會即無青年黨，沒有黨，我當然不會參加什麼政團同盟了。

「少中」發起於民國七年，在這個學會發起以前，曾琦寫過一本「國體與青年」，首先在上海的「救國日報」發表，隨後由王光新在北京替他印成了一本小冊。曾琦寫這本書的動機，大概是因為經過了民五袁世凱的稱帝，民六張勳的復辟，民四日本既有二十一條的提出，民國六七年之交，段祺瑞秉政的時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畧，更是一天緊似一天，他和他的「羣」留學日本的朋友，也就正是在這個時期罷學歸國。一方面他深深感到國體發生了動搖，

同時外患又是如此的緊迫，因此他把民國締造如何如何艱難，一班革命先烈如何如何純潔，當前的國勢又是如何如何的危險，用他那枝流暢的文筆，在這本書裏說了一個痛快，無非想激發一般青年一點愛護『中華民國』的熱忱，大家起來同謀國事的補救，用意是很純潔而正當的。會琦在留學日本以前，我和他在上海的震旦大學同過一時期的學，大概知道他的爲人：他讀過不少的中國書，舊詩文頗有根柢，在他以前一般維新革命的仁人志士，也給了他很大的影響，因此把他造成了中國歷史上隨時「以天下爲己任」那一類的一個典型人物。我和他同學的期間，因爲彼此常有接觸的機會，我在他的眼中，也許覺得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因此在他和王光祈，陳愚生（原名瀆），張尚齡（即張夢九），周無（太玄），李大釗（守常），雷寶善幾位發起『少中』不久，便把我也就拉入這個學會了。這大概是民國七年底或八年初的事，其時我正在南京教書，後來有不少東南大學，金陵大學，以及河海工程學校的優秀分子加入了這個學會，便是由於我的關係居多。

「少中」發起的動機既如上面所述，好像一開始政治意義便相當濃厚，可是一看它的宗旨和信條却又不然。「少中」的宗旨很簡單：『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信條更只有八個大字：「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約束既是如此疏闊而輕鬆，



因此對於會員的思想和行動，確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束縛，除掉友情的交流，知識的交換，事業的互助以外，在最初幾年「少中」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給我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這與我後來所過的黨人生活，和政治上一切鉤心鬥角的把戲，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少中」以民七成立，經過了民八的五四運動，便一天天的擴大起來。因為「五四」一幕，有不少的「新少年」應運而生，而各地的青年組織，也有如風起雲湧，「少中」既已有相當的歷史，而「少年中國」月刊出版，也頗能予人一種清新的印象，因之由各地會員的展轉介紹，加入的乃逐漸加多。可是因為對會員資格的審查相當嚴格，一直到十二三年學會無形瓦解為止，據我的統計，也不過一百零八人而已。現在我手邊沒有這本會員名冊，單憑我的記憶所及，却只能寫出八十名左右，恕我不願把這個不完全的名單在這裏公布了。

從民七到民九的年底，這兩年多的「少中」會務，可以說是由王光祈一人主辦，關於會務報告的印行和少年中國月刊的出版，大抵都是出於光祈的規劃。光祈這個人的長處甚多：辦事負責任而有條理，待朋友充滿熱情，求知甚切，而表現力也很強，我從沒有見過他一篇模糊不清的文字，也從沒有見過他一次拖泥帶水的行爲，我自從認識他一直到他在德國因殉學而死，前後經過十五六年的時間，雖說我後來有十三年不會和他見面，但我卻沒有一個時

候不受他精神的支配。

可是光祈畢竟是五四時代的一個青年，他的祖父是四川一位有名的詩人，他自己的詩也做得不壞，因此在他的思想和行爲上，到底還是帶着幾分的浪漫色彩。我現在還完全記得：正是民國九年的一個冬天，我在南京寓所一間斗室中的油燈下看書，忽然聽得敲門聲甚急，我開門一看，只見光祈，同時在漆黑的天空下，我還看見兩隻發光的眼睛從光祈的身後，一直射到我這邊來，我於是連忙請他們兩位入內，在燈光下一看，知道另一位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小姐，操純淨四川的口音，身材窈窕，舉止大方，我當下心裏完全明白，便顧左右而言他，問光祈出國的行期已否確定。他告我正是爲了出國的準備而來。轉問我能不能同他們一陣到上海去。其時我正接受了上海中華書局編輯的聘約，也正要動身，得此良伴，當然分外的高興。兩天後，我和光祈同到滬寧車站，他原約定那位北京同來的小姐在車站候他，不想她早已搭上光一班的火車走了！這一下真把光祈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雖然只好勉強上車，但總覺得這位從來不會到過上海的年輕小姐，可能遭遇什麼不幸，我越是說一位漂亮小姐總會有的辦法，他便越是懷疑，加上這一天又是一個淒風苦雨的冬天，雪珠打在車窗上叮叮作響。我們這兩個少年中國的少年，瑟瑟縮縮的坐在三等車廂裏，各想各的心事，一會兒談得興

高采烈，覺得天下事大有可爲；一會兒又憂來無端，萬念灰冷；心裏越是着急，車子走得越慢，好容易挨過七八個鐘頭，才到達上海的北站。當我們住進一品香旅館還不到二十分鐘，一個四川女子口音的電話，便來自遠東飯店，原來光祈之必住一品香，是早已和那位小姐約定的。於是一天的愁雲慘霧完全吹散，光祈又依然恢復了他那飛動活潑的神情，戀愛對於一個青年人本來有這樣大的魔力，我是半點也不奇怪的。

光祈留在上海，大致有兩三個月，在這一期間，他把申報駐德特約通信員的工作接洽好了，我便進了中華書局。同在這個時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便是我和光祈同往中國公學與梁任公先生作了第一次的見面，也是最後一次的見面，我們同樣讀過梁先生的文字二十年，對這位維新老鬥士的印象當然是很深，其時任公雖還不到五十，已累累有幾分衰態，但聽他兩小時的講演，精神却是很好的。

關於光祈的留學計劃，我完全不知，但我知道他沒有錢，因為如此，他便只好坐法國郵船的四等艙先行，那位四川小姐乃坐下一班的三等艙後走。等到這位小姐到達巴黎以後，光祈即從柏林前往歡迎，絕沒有想到她在來法的途中，已與另一位同船的王姓青年發生了不可分的關係，竟視光祈如路人！這一打擊非同小可，於是光祈乃一氣重返德國，經過一時期的

痛苦以後，始得恢復他一面讀書一面工作的正常生活。可是這與他後來專攻音樂，乃至留德十餘年不肯回來，不是沒有關係的。光祈在德的生活，一直是很忙很苦的，一面要爲申報，新聞報寫通信稿子，一面要上課，還要在圖書館看書，最後五六年，更寫了十幾本介紹西洋音樂的小冊子。（全部在中華書局出版）當他已取得音樂博士的學位以後，蔣先生接受我的提議，打電給駐德使館的參贊譚伯羽，問他何時可以歸國，願担任任何種工作，他不幸突患腦溢血的不治之症，斷送了他寶貴的生命於異域了。

一個人的一生中，能得着一個相互了解，相互信賴，而又真正可與共享的朋友，是太不容易的，假令光祈不死，我相信必定能領導我多有一點成就，也可能減少我一點過失。

自民十光祈去德以後，處理「少中」會務的責任，無形中已落到我的頭上。「少年中國」與「少年世界」兩種月刊，改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由我担任編輯。此外一方面因爲上海的交通便利，凡學會會員道出上海的，我總有和他們見面的機會；另一方面，則以會員出國留學的日子多，大致分往法德英美日等國者，前後不下三四十人，凡他們稿件的投遞，書籍的出版，報館通信的接洽，以及一切收欸匯欸的瑣務，也大抵由我一人代辦。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是相當繁重，但以當時少年喜事的心情，同時受着一種誠摯友情的驅策，還是覺得津

津有味，樂此不疲。

從民八「五四」到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這個五年間是中國一個新政治醞釀的時期，同時也就是一個大混亂種因的時期。「少中」的宗旨本來是標榜「社會活動」而不願參加實際政治的，可是少年畢竟經不起時代潮流的鼓盪，於是到了十二二年，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學會的會員是否可以參加政治活動的問題，便在「少中」的會員間起了激烈的爭辯，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棧園，在上海哈同路一七八九號我的住宅，都是他們集體的或個別的辯論場所，經過一年餘爭論的結果，事實上所得的結論，只是「各行其是」。於是會員中內李大釗，恽代英，鄧中夏（原名康），毛澤東，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趙世炎，侯紹裘，楊賢江等等，便去攜他們的共產；曾琦，李璜，張夢九，何魯之，左舜生，余家菊，陳啓天，劉泗英（原名正江），魏嗣燮，趙會曉，棟登洛等等，便幹他們的國家主義；我記得有一次兩方面的分子約七八人，在我上海的住宅中辯論一個整天，臨別鄧中夏在門外向我握手說：「好，舜生，我們以後在疆場相見吧！」這大概要算是最後一次的破裂，現在回想起來，倒是頗有趣的。

還有幾點要在這一段中補叙一下：我和毛澤東第一次的見面，大概在十二二年上海安南

路民厚南里口一家商店的前樓，隨後又在民厚北里口小菜場邊擺過一回龍門陣，覺得他了無異人之處；二，學會有一位詩人康白情，後來跑到美國，隱射李鴻章，改名康洪章，居然聯合「少中」會員孟壽椿，康紀鴻等，發起了一個「新中國黨」，可是只曇花一現；三，加入國民黨的會員也有好幾位，在政治上演過一幕有聲有色的悲劇的，却只有一個周佛海。根據上面這個簡單的敘述，已可看出這個青年團體對最近三十年的政治關係爲何如了。

## 三 自五四以來

(中國進入了一個動盪不寧的時代)

人們對於五四運動的評價，因立場的不同，而有兩種相反的看法：有人以爲這是中國新思想，新文化，新政治的發端，有人則以爲這是近三十年來一切動亂的開始。其實說起來，却是兩者都對，也都不對。

就五四運動原來的意義說，僅僅只是一種青年的愛國運動，原因是由中國在巴黎和會遭受日本的壓迫，而英美法諸強也一味遷就日本，置中國對山東問題的意見於不顧，因此激怒了中國的青年，乃將歷來辦理對日外交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頓，曹汝霖的住宅被燒，同時要求將曹章及陸宗輿免職，結果北大及其他學校的學生被捕者三十餘人，風潮愈趨擴大，以致鬧到全國罷課，若干大都會罷市，政府與學生雙方相持不下，一直到六月三日上海也罷了市，

然後學生才得了完全的勝利：曹章陸一律罷免，學生無罪釋放。

本來只是這樣一件簡單的事實，但何以會牽涉到新思想，新文化，乃至對政治也生了絕大的影響呢？這便說來話長了。

原來中國的辛亥革命，僅僅只推翻了兩個滿清。革命的果實，却被一個專制餘孽的官僚袁世凱，以一種變戲法的手段收穫去了。民二倒袁不成，反爲袁氏所敗，因此所有的革命黨人，便只好重度他們的亡命生活，徐圖捲土重來。袁氏不能逆取順守，反而來一套復古的反動，對外更不惜重重屈辱，甚至連民四日本所提的二十一條，也大體接受了。民五的袁氏稱帝雖被撲滅，民六乃又有張勳的復辟，由這兩幕，更引出北洋軍閥在中國胡鬧了十年，這便是這一時期中國內部情況一個大致的輪廓。

國際的形勢怎樣呢？世界經過第一次的空前大戰，俄德兩大有名的帝國，都在這一期中垮了台；一個自命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在這一期中居然出現；日本乘歐戰混亂之際，列強無暇顧及遠東，乃施展渾水摸魚的手段，對我大肆侵畧，更藉口顛覆德國在遠東一個惟一的根據地青島，不惜一舉攘奪我國的山東。中國也算是一個參戰的國家，雖說沒有正式出兵，可是有十幾萬的華工在我們友邦的後方從事工作，即令不能令我們從勝利得着怎樣的好處，至



少總不應該對我們更加一種處罰。但列強爲了息事寧人，竟不惜與日本一鼻孔出氣，甚至連富有理想和正誼感的威爾遜總統，在和會中也表示對我們愛莫能助。這便是我們在這一期中從冷酷的國際間所遭遇到的屈辱。

內外情況的交通如此，剛好到了「五四」的前夕，胡適等提倡一種白話文運動，已漸漸到達了成熟的時期，這也可說是近三十年來一件第一等的大事。原來在胡適以前，中國有過不少的人提倡廢八股，但絕沒有人敢於主張廢古文，在維新與革命兩派中的宣傳家，有人懂得中國舊有的小說，戲劇，歌謠，彈詞等等，其體裁是一種有力的宣傳工具，例如梁啟超，便知道用白話寫「新中國未來記」去提倡他維新的主張；陳天華也懂得用白話寫「猛回頭」來鼓吹革命；可是這究竟只是少數人提倡提倡而已，既沒有理論上的充分發揮，也很少有人用全力向這方面去繼續工作，甚至他們的領袖人物如康有爲章炳麟等，都是到死還在寫古文，作舊詩，因此畢竟不能成爲一種風氣。清末有一位系統的介紹西洋思想的嚴復，一位大規模介紹西洋文學的林紆，但他們兩位都是古文家。吳汝綸爲嚴復序「天演論」，恭維嚴氏的譯文「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甚至連王國維讀嚴譯的「穆勒名學」也感到比讀穆勒的原著還要難懂；林自己不懂西文，但他所譯的小說却多至百七十餘種，在中國風行了近二十年

，可是究竟因爲文字的關係，即中國舊制的中學生，也未必人人都能暢讀。因此種種，在胡適以前，凡用文字來發抒情感，表達思想，或發表政治主張，只是少數士大夫階級的專利，與大多數的老百姓絕不相干。而所謂士大夫也者，又憑藉他們這點文字專賣品去勾結權貴，獻媚豪門，爲腐爛的統治階層「潤色鴻業」，以保持他們那個封建的殘壘，使民主制度無法在中國生得起根來，一直要等到白話文逐漸風行，這種情形才漸次改變。加以這個時候任北大校長的是蔡元培，他以翰林而參加革命，以一個舊學極有根柢的人而赴德留學，他對新舊學問有一套合理的看法，而於新舊之爭則不惜爲新者作有力的辯護，「五四」其所以能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發生絕大的影響，北大做了這個運動的大本營，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中國的思想界原有其相當的地位，儒墨無論矣，即法家亦不主張財富集中於少數私人，道家則有一種反統治階級的思想，尤爲激烈。清末外來思想輸入，社會主義一體系的思想，亦即挾之以俱來。記得四十年前我在高小讀書的時候，已經在長沙定王台圖書館見過這類的書籍，有一本姓趙的和一部用章炳麟名義譯的講社會主義的書，我都看過；而日本幸德水秋的那本「十九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的小冊子，則對我所留的印象更深。辛亥革命後，江亢虎印行了他的「洪水集」，並且發起了社會黨，似乎想由理想而形

成一種運動了。在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正式成立以前，孫中山已經在歐遊以後接受了社會主義，成爲他三民主義的一環，雖說後來他的同志在革命初期只側重「民族」而忽視了「民生」，但中山却是確有所見，持之甚力。中國因爲早已有這種思想的背景，因此對於社會主義的輸入，並不感到何等的新奇。可是使中國人接受這思想而見諸行動，則是一九一七年即民國六年俄國革命成功以後的事。

我在上文已提到，中國自辛亥以來以迄「五四」，雖說經過了一度的大革命，可是在各方面並無顯著的進步；因爲軍閥的割據與剝削，列強的侵畧有加，人民且更趨於窮困；國民黨以革命屢受頓挫，其勢也不能不另想辦法；剛好在這個時候忽有俄國革命的成功，「五四運動」又居然給予官僚軍閥以一種精神上的打擊；積是種種，顯然已在中國醞釀一種新機。以中山的銳敏，當然已看出了這樣一個徵兆，因之一面埋頭完成他自己理論的體系，一面更準備提出他繼續革命的具體主張。正當這個時候，蘇俄對內對外的形勢漸趨穩定，爲求自己進一步的安全，乃不能不向外擴大她赤化的影響。蘇俄領導者的手法是相當高明的：他們決定一面以公開外交方式博得中國多數人民的好感；一面另以地下的方法，從事煽動中國的赤化；在一九一九（民八）及一九二〇（民九）的兩年間，既先後以他們外交人民委員會代理

委員長加拉罕的名義，發表兩次對華宣言，表明願廢止帝俄時代與我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並放棄所取得的一切權益；同時又不斷的派人勾結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青年，因之在民國八年至十一年之間，即先後在中國有「社會主義青年團」，「勞工協會秘書部」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而「中共」一經成立，即已加入第三國際而接受其指揮了。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中山與越飛在上海所發出的共同宣言，雖經雙方明白承認蘇俄的共產組織與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但這依然是表面的一套，實際則不是這麼一回事。蘇俄公式外交的進行，係就當時情勢分別向北京和東三省接洽，但爲蘇俄所特別注重的，却是中山所代表的這個力量。中山急於要取得國際的支援，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以完成國家的統一；一面又看見「中共」已在開始行動，而各地青年組織如學生聯合會之類，也確爲一股新興的活力；再加上十一年陳炯明的叛變，所給予他的刺激更深；因此他深切的感到國民黨有整理，加強，並輸入新血液的必要；此即十三年國民黨改組與「聯俄」「容共」一幕之所由來。當時國民黨內與黨外雖有人對這個政策表示懷疑，反對，但大勢所趨，命運所定，少數不同的意見，當然不能發生何等的影響。平心而論，以蘇俄當時那樣一副親善的面孔，加以她那種宣傳與組織的巧妙技術，以中山自身自民元以來逐漸形成的一種垂暮心情，又眼見一大羣熱情洋

盜的英英年少正在躍躍欲試，他除掉在預事防閑徐圖補救的前提下，來從事這一因勢利導的冒險工作以外，又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

在這一段的最後，還有幾件事和幾個人，應該在這裏加以補述。

所謂五四運動，我並沒有直接參與，在這個運動爆發的當時，我正在南京教書。我記得是在民八五月的下旬吧，忽然來了兩位北大的學生，一位是許德珩（楚僧），一位是黃日葵，他們好像是拿了王光祈的信來看我的，因為他們都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友。我問明來意，才知道他們是來運動罷課，並且想找一點其他方面的援助，因為這個時候被捕的學生還不會釋放，他們是想擴大風潮以促成政府的屈服的。他們對於南京人地生疏，我當即陪他們出去跑了一陣。第一個去看了當時江蘇督軍李純的一位幕僚白堅武，其次去找了一下其時駐在衡陽有名的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的駐甯代表某君，當時許黃究以何種因緣能去看這兩位，我完全不知。白堅武很像一個樣子，談吐態度，都不失一位漂亮幕僚的體統，對學生似乎深表同情；吳佩孚這位代表却很糟，我們是午後一點以前到達他那辦事處的，他還不會起床，我們坐了好一會，他才煙容滿面的走了出來。我已十分不耐，但許大砲（這是後來「少中」朋友加給楚僧的一個綽號）依然把來意陳述了一番，那位代表以一種官僚姿態答應轉電他們的師長

，然後才恭送如儀的把我們送了出來。

當天的晚上，我們會同了幾位東南大學的朋友同往金陵大學的宿舍去聚談，金大幾位「少中」朋友已經睡了，還是從床上拉了起來，一直談到深夜，結論是南京讀書的空氣頗濃，官方已有相當戒備，罷課怕不容易實現。我們走出金大，已經是十二點過了，滿街戒嚴，遠遠聽得軍警高呼口號，這一來倒使我們感到非常尷尬了！於是決定避去大衙不走，專走沒有軍警的冷巷。從鼓樓的金大到夫子廟附近的交通旅館是相當遠的，其時的南京又還沒有街燈，只好憑着我這個沒有十分把握的嚮導，領導着他們兩位在黑暗中亂竄！轉彎抹角，一直走了四五個鐘頭，終於找不着交通旅館的所在，幸而一家豆腐店已開門工作，上前一問，才知道旅館就在眼前，真是喜出望外。一天一晚的緊張工作，頗感疲勞，好好睡了一會，才又起來往昨天約定的幾處演說。演說的工作是由許黃兩位真代表担任，我這個冒充的代表只坐着傍聽，許大砲是聲容並茂，日葵也近於慷慨悲歌，可是在我聽來，他們演說的技術並不怎樣高妙。這件事是我生平接觸羣衆的破題兒第一遭，所以至今還留下了一個清晰的印象。許黃在南京奔走了三天，又到上海會同其他的代表繼續活動，居然鬧成了上海的「六三」罷市，所謂五四運動，才宣告勝利閉幕。日葵白晳面圓，西裝革履，是一個多血質的美男子，偶然

和朋友通信，也往往要寫得情致纏綿，和我的交情不壞，後來他加入了中共，已因病死去多年。楚僧在抗日期間和我在參政會共事，其少年意氣，似已非復當年，最近已向中共棄權，好像相當起勁，低回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民國十年一個春天的晚上，上海亞東圖書館的主人汪孟鄒約吃飯，到的都是當時幾個雜誌有關係的人物，我是和王光祈魏嗣鑾宗白華一陣去的，在那裏我第一次見着陳獨秀朱執信戴季陶。獨秀和光祈本來很熟，見面便笑光祈一到上海便變得十分的摩登，問他有了甚麼問題，光祈只好笑而不答，我覺得獨秀的感覺真是非常的銳敏。朱執信圓圓的面孔，兩撇小鬚鬚，勁氣內斂，出言有序，給我的印象最好。戴季陶穿一件琵琶肩的背心，三十四五的光景，民初張丹斧劊苦他「面如冠玉」，則已非其時。在桌上口講指畫，大談他交易所的得意之作，把我青年時期在民權報讀戴天仇文章的一些幻想，全部取銷。後來知道他在南京搞孝園，敲木魚，當院長，在方格柙裏而寫楷字，總覺得陰陽怪氣。抗戰中在公共場所儘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但我始終有計劃的保持着，沒有再和他談過半句話，一直到他在廣州自殺了，才回復了我一點對他的同情。

惲代英（子毅）和鄧中夏（原名康）加入「少中」都很早，但和我發生密切的交往，却

是我到了上海以後的事。他們兩位都是中共初期最賣力的人物，代英還帶三分做作，中夏則純任自然，大氣磅礴，假定他們兩位不死，不知比較今日的毛澤東劉少奇爲何如。我根本不是一個革命者，且根本不會對任何主義發生迷信，但他們兩位却對我下過工夫，還拉我在「嚮導」和「中國青年」上寫過文字。十四年中山死了，我曾有加入國民黨的衝動，但卒以找不到適當的介紹人作罷。稍後加入了青年黨，也只是一種朋友關係的偶然。在後面的幾段，可能有比較詳細的敘述。



## 四 「五四」以後的中國出版界

### 和教育界

(附帶敘述我一點法遊觀感)

我任上海中華書局的編輯，是民國九年冬天的事。我初進去的時候，在該所任職的不過八九十人，分作幾個部門，有中學教科，小學教科，兒童用書，英文，雜書，等等名目。中華書局創辦於民國元年，本來是以印教科書起家，因初期發展太快，民國五六年曾遭遇極大的困難，負債累累，幾至無法支持，一直到八九年之交，才逐漸恢復。這個時期，正值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也就是中國出版界進入一個繁榮時期的開始。中華爲適應需要，在編輯所另闢了一個「新書部」，我所擔任的職務，便屬於這一部門，最初，我上面有一位主任，戴姓，日本留學生，人很老實，我進去以後，他便樂得輕鬆，幾乎把這一部分的責任，全權

委托了我。不到兩個月，他另有高就，走了，於是這一部的主任，便名實都由我來擔任了。

新書部因爲是一個新闢的部門，對於工作方面，原無具體的規定，一切可以聽我自由計劃。老實說，我自己既無多大把握，書局方面更沒有若何成見。其時我雖然已有了一羣朋友，但因爲我對他們懷有更大的期待，並不希望他們在一種半成熟的狀態之下，便輕於從事翻譯或著作。可是我除掉乞靈於這班朋友，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因此，我還是發出了三四十封徵求稿件的專緘，並請他們介紹宜於從事這類工作的其他朋友。大致不出兩個月吧，我便從國內外收到了不少的回信，約定的稿件已有十幾種之多，於是我便大吹大擂在上海各報發出了一個所謂新書的出版預告！這個廣告激動了一位多年從事譯著的老將馬君武先生，他很高興的把他兩部早已講好的稿子寄了來，其一爲「達爾文物種原始」，其一爲「赫克爾一元哲學」，聲明願意參加在我們這一套新書裏面出版，並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這實在鼓起了我不少的勇氣。

其時我在南北兩高師還有不少研究教育的朋友，我平日已在各種刊物上，看過他們許多關於中國教育方面的意見。中華書局本來出版得有一種「中華教育界」月刊，可是不能按期出版，內容也畧嫌陳舊，且太不充實。於是我向書局的總經理陸費伯鴻（逵）和總編輯戴懋

哉（克敦）進言，請他們把這種月刊也交給我，我保證內容可以革新，並可如期出版。經過他們兩位欣然同意，因此我又兼任了這本「教育界」的編輯。我編輯這本雜誌大致有三四年，不止一班青年教育學者的稿子被我拉了來，乃至他們一班先生的稿子也被我拉來了不少。其時中國的教育正在欣欣向榮，經過杜威來華一度的講學，更增加了不少的生氣。我對於這種表面的蓬勃氣象，自然也相當樂觀，可是我因為興趣和職務的關係，不能不從多方面去接觸他們這一羣人，也強迫着我去讀他們的著作和理解他們的意見，因此也就隱隱的引起了我一種憂慮：我覺得他們對於外來的教育制度，思想和方法，只是忙於接受而缺乏批評，過重形式而內容貧乏，尤其對中國所固有的教育制度，思想和方法，也太少融會。我的腦子裏並沒有張之洞以來的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沒有陳立夫們所提倡的所謂「中國本位文化」，但五四以後陳獨秀等所主張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學與民主」這一趨向，我却至今還是承認不錯，同時我也決然反對把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一筆勾銷。根據我這個觀念去看五四以至抗日以前的中國教育，果然算得盡了發揚科學與民主的職責嗎？不錯，多少是有的；可是由它所發生的力量，能制止或沖淡後來從政治上所產生一切反科學與反民主的邪魔外道嗎？如何把這個形勢從根本上扭轉過來，這便是今日最嚴重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話說到題外去了，還是回到本題罷。新書部的出書逐漸加多，雜誌除自編的「教育界」一種以外，後來外面委托書局出版的雜誌，如梁任公張君勳張東蓀俞頌華等有關的「改造」，北高師的「教育叢刊」，張耀翔編輯的「心理」，劉伯明（經庶）吳雨生（宓）梅光迪（覲莊）等有關的「學術」等六七種，也全部交由新書部處理。我這個時候做事的精神是一味貪多，可是究竟感到人手不够，於是只好再找朋友幫忙，例如現在頗知名的人物如田漢，張聞天，陳啓天，李達等等，我都委屈了他們到這個小小的新書部裏和我共過一時期的事。

我現在回想起來，從五四前後，一直到抗日的戰爭爆發以前，這個十五六年之間，實在是中國出版界的黃金時代。所出版的書，方面一天天趨於複雜，量固然加多，質也提高了不少；不但新書可以暢銷，便是綫裝書也隨着一般人求知慾的亢進，忽然風靡一世；例如商務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的「四部備要」，乃至「圖書集成」，不待出版，預約的即已不少。幾家大書店的情形固然如此，較小的如開明，北新，生活，亞東以及後來新興的若干小書店，也無不以競出新書相號召，而且各有各的特色。假定後來不有圖書雜誌審查一類的背時辦法，又不遇着八年抗戰的傾挫，一切聽其自由發展下去，其成績當然更有可觀。可是話又說回頭，今日中國整個的文化，已全面的進入了一個被摧毀的時期，其

結果令人不忍想像，區區一個短時期中所積累的一點點成績，又值得怎樣的去懷念呢？

在我把五四以來的中國教育界和出版界作了一個簡單的述以後，我想把中華書局的總經理，同時也就是該書局創辦人的桐鄉陸費伯鴻先生，作爲當時主持中國出版事業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來談一談。

伯鴻早年曾參與過革命，一度加入劉敬安等所組織的武昌日知會。在辛亥以前，他便在武昌察院坡經營了一家小規模的書店。後入商務印書館，從事小學教科書的編撰，並會任「教育雜誌」的編輯。民元中華成立，即以出版教科書與商務競爭甚烈，幾乎凡有商務之處，即無一不有中華，一時全國中小學所用的教科書，差不多爲這兩家書店所包辦。伯鴻的學識，我不完全明白，但我知道他治事極勤，頗有「狄克推多」的氣概；頭腦非常清楚，具有豐富的常識，歡喜看書，對文學有相當素養；性情爽快，雖自信甚強，任人則甚專；我和他共事十年，我固然沒有麻煩過他，他也不會麻煩過我，因此相處得非常融洽。到民國二十年，我在復旦兼得有課，同時對青年黨也負了部分的責任，實在感到相當的疲勞；加以坐得太久，也未嘗不想走動走動；因此我向書局提出辭職。伯鴻似乎很難過，一再加以挽留，並力勸我不要幹政治，認爲於我的性格不合。後來看見我非走不可，又對我說：「假如你幹政治覺得

厭倦了，希望以你的同鄉范靜生先生（源濂）爲例，依然回到書局來。」我覺得他這個意思是很可感的。抗戰既起，政府有國民參政會的設立，伯鴻也應聘任了一名參政員，曾兩度由香港飛重慶出席，我又有機會和他盤桓了一個時期，其時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不久便死了。我記得某屆參政會在開幕後舉行了一個追悼會，同時被追悼的是西南聯大教授羅文幹，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和伯鴻，他們都不到六十，同在抗戰中死去，實在是很可惜的。

我在民國十五年的秋天，有機會出國遊歷一趟，這也是伯鴻的好意，由書局送了我三千元，否則我是絕對沒有這個力量的。於是我把妻子寄住在湖南的岳家，老父母則在南京，暫由兩個哥哥負責。出國時的心情不怎樣愉快，但我究竟還只有三十二歲的年紀，勇氣却是十足的。三千元包括來回的川資和製裝費，並且打算在法國至少住一年，寬裕自然談不上，可是我看見許多勤工儉學生，手上只有一二百元便敢於冒險出國，因此也就沒有什麼恐懼。

大概在我十六七歲懂得自動看書的時候起，對於西洋文化便不勝其嚮往；可是前後在上海住了八年，眼見那些洋鬼子的所行所爲，却又引起了無限的懷疑。一直等我跳上了法國郵船，我才有了一種接觸西洋文化的實感；過去在震旦讀過三年的法文，也是上船以後，才感到大有用處。

船在沿途的香港，西貢，新加坡，可倫坡，波賽停靠，我總是借着我同房的袁君一陣上岸去遊覽的。眼見英法對殖民地經營種種，不勝感喟；回顧國內各方的情況，在許多方面，乃至並此類殖民地而不如，又爽然若失。當時我會將沿途的見聞，用通信方式寄交「蘆蕪週報」發表，我記得從表面上所得的印象，總覺得英國人的能力較強，以香港新加坡與西貢的堤岸一帶比較，也覺得前者較為清潔整齊，富有生氣，而在英殖民地一般中國人的生活，也究竟比安南人似乎要好些。但這畢竟是走馬看花得來的一種直覺，到現在，我以為這類比較根本也就是多餘的。

在紅海受過了我生平不會受過的熱，過波賽轉入地中海才感到一派的秋意，昏昏的頭腦，又清醒了過來。我記得是八月十四的一個清晨，我們的船到達了法國的南方大港馬賽，正下着濛濛小雨，着秋服已覺稍涼，臨時加上一件大衣，才和袁君一陣登岸。留馬賽一天，法國給我的最初印象不算太好：碼頭和街道都不怎樣清潔；海關人員毫不熱心檢查，對十個佛郎却相當滿意；兩人五件行李，由碼頭運到車站，被搬夫敲去一千三百佛郎，而且面孔並不好看；只有一家義大利餐館的一頓午餐是不错的。

由馬賽去巴黎坐的頭等臥車，車上的一切一切，與京滬路彷彿，惟速度過之，但回溯我

生平坐火車最愉快的經驗，却是民國二十五年夏天坐「燕號」由門司到東京的那一次。次早到巴黎，霏霏的小雨依然下着，更感冷意。因為和我們同車來的有一位摩洛哥蘇丹，因此車站的樂聲大作，以班樂衛爲首的一班鬧員，都峨冠禮服出迎，我和袁君，兩個東方的黃面孔，也居然在樂聲中邁步走出了車站。

在去法國以前，我讀過一部分法國的歷史，對一七八九以後的現代史，更了解得詳細一些；法國文學是我素所欣賞的，一二十年來，凡經人介紹過的，只要讀得下去，我大抵都涉獵過。因為有了這樣一點基礎，我對巴黎的一切一切，並不感到怎樣生疏；參觀了二三十處凡到巴黎的人所必到的地方，總好像是我的舊游之地，衷心雖然喜悅，却是了無驚異。因為如此，我在拉了區一家旅館只住了十來天，跑遍了若干有名的書店，同時也在色納河畔的一羣舊書攤上，低回留連了好幾遭，便挾着一箱子的新舊圖書，溜到巴黎的鄉下去住起來了。除每星期到城裏上幾次課，甚少出門；除鄧孝情蕭石君等幾位朋友以外，也很少見面。

法譯辜鴻銘先生的一本「中國民族之精神」，我是到法國以後才讀過的，他對中國文化的大棒特捧，我並不苟同，但他把中英德法四國拿來作一比較，說英國人博大而稍欠精深，德國人精深而稍欠博大，既博大而又精深的只有中法兩國，我覺得這樣一種觀點雖不免流於



武斷，但我決不願否認法國人在文化上可以作中國的益友。毛澤東的「一面倒」，也許還要延續一個很短的時期，但在一切摧毀殆盡以後，一個未來新東方文化的建設，則有賴於中日兩國學人的切實攜手，我無條件的期待日本復興，其主要意義是文化性質的。聽說這幾年有不少的日本人過度的歡迎美化，這也許並不類似毛式的「一面倒」。但我總希望日本人把自己優美之點，多保留一點下來。

在巴黎住了半年，得着家信，我的第二個哥哥死了。我生長在一個破落的讀書人家，上有兩個哥哥，四個姐姐，下面還有兩個妹妹，我算是我父母的少子，也是我兩個哥哥的愛弟。我的大哥愛我，表現於他以全力支持我讀書；我的二哥愛我，却只藏在心裏，可是他有文字工作，一定找我推敲；有不願告人的苦悶，一定向我訴說；論渾厚與學力，我老二不及我的老大，論天才和富有一種浪漫的活力，老大又不如老二遠甚。老二之死，增加了我對家庭的責任，也引起了無限的鄉愁，靜靜的住在巴黎郊外，簡直害着嚴重的失眠症了。我的房主人爲我收拾房間，發現我床前有一瓶安眠藥水，爲之大吃一驚，我不得已接受她的勸告，再度恢復我出遊的生活。

我的錢本來是極有限的，並且，還想節省着多帶幾本書回去，因此所謂出遊也者，也就

只能以一點兩點鐘的火車旅程爲限，不能走得太遠。凡爾賽宮過於富麗，不大合我的脾胃；楓丹白露的明媚風光，却對我有較強的吸力；雨果的故居和他的手澤，引得我留戀低回；若瑟芬的幽室瑯房，和她那幅絕世風神的畫像，就至今也還縈繞於我的夢寐。去巴黎約四十幾分鐘的火車，地名夏特勒，是一座自高盧以來便有名的宗教城，那裏有十三世紀的教堂，有三百年前的建築，風景有類於我們的蘇常，而物質的設備與藝術的烘托，又非蘇常所能望其項背。三三五五白髮如銀的修道士，一羣一羣立在洗衣池畔的少婦少女，更渲染得這座古城成了一幅畫圖。東坡詠歎杭州的詩：「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好像正是描寫着這裏的人物。我住在一家清潔的旅店，夜闌人靜，開窗把月光放入，憑欄遙望，那兩座古教堂的尖頂，高聳於蔚藍的天空，我便在這樣一個萬籟俱寂的環境中，度過了兩三小時的夜生活，深深感到巴黎未必能代表法蘭西文化的全貌，也許要在這類地方才可以滋潤着這個藝術民族的靈魂。

我在留法的期間，仍隨時和王光祈通信，彼此的生活情形，完全知道。他其時住在佛朗克福，希望我到德國去玩一次，我告以絕無可能。一天，忽然接着他一封保險信，寄來美鈔二十五元，他要我停止自炊，過兩星期較豐裕的生活，必於我的失眠症有益。我知道他這個

錢是三四元一千字換來的，用既不忍，退又不能，一直延到我回國的前一月，才寄還他四百佛郎，可是我終於沒有去德國和他再見一次，畢竟是我的遺憾。

我在準備回國以前，又搬回巴黎住了十來天，幾處可以幫助我了解法國史的博物館，一再的去細看了一看，縮減旅費，買了幾部大部頭的書。從馬賽東航的船期在八月十七，我選擇了去年到達的這天八月十五，依舊在一個濛濛細雨的深秋暮色中，悄悄的離去了巴黎。詩人蕭石君，送我到車站，在握別時一切無從說起，我爲他低低的誦了東坡一首絕句：「悽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來奈老何，淚眼無窮似梅雨，一番勻了一番多。」我不知道世間除了友情與藝術，還有什麼更值得我們珍重的東西。

船泊黃浦江法國郵船的碼頭，老友楊傳渭來接我，他告我一個不幸的消息：我的大哥在一星期前又已去世，一雙七十的老親，正在遙盼我這個惟一愛子的歸來。於是我把行李和書籍安置妥當，伯鴻約我吃了一頓晚餐，我便搭了當夜的臥車，去南京爲我大哥料理未完的後事。只一星期，便仍回上海重操我編輯的舊業，一雙老父母也接到了上海和我同居，「包袱不怕重，越重越有趣，我的心境還是很泰然的。」



## 五 「九一八」以後

(這一節包括幾個有名人物的故事)

我出國十四個月，(十五年七月至十六年九月)國內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黨吞共聯俄的政策已告結束；國民政府已在南京成立；北伐雖還沒有完全成功，但大致的趨勢已定；國民黨雖已消共，但對青年黨並沒有放鬆，我們對國民黨也還是立於反對的地位。

自十六年底到二十年「九一八」的這個三年多的時間，我除掉為青年黨做了一點工作以外，幾乎全部的時間都埋頭於中華書局的編輯所，同時也多看了幾本書。一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繼之以次年「一二八」的淞滬之役，我才把我大部的注意力移到國事方面來了。其時我已把中華的職務辭去，每星期僅在復旦和大夏上十幾點鐘的課，時間比以前充裕得多。上海有一個俱變了性質的「中社」，其時已變成了一個上海人士對國事交換意見的場所，

我在這裏新認識的朋友頗多，「一二八」戰役發生以後，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這裏開會。這一次的戰爭延長了三十幾天，雙方的兵力合計在十一萬人以上，一直拖到五月五日簽訂了一個有名的「淞滬協定」始告結束。當戰事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我和王造時兩個被上海四十個公團推舉前往北平，目的在發動張學良與佩孚抗日。我們到達北平以後，先到石駙馬大街去看熊秉三（希齡），知道北平的空氣相當岑寂，張吳更絕對不能有所舉動，可是爲完成我們的使命，這兩個人總得會一會，因託熊爲我們先容。見張是熊陪我們去的，其時張住在順承王府，頗有一點排場。這一晚他穿了一件藍色的長袍，當他站在電燈下面和我們握手的時候，我覺得他的樣子長得不錯，令我即刻想起馬君武那首「趙四風流朱五狂」的絕句，假定他能唱小生的話，叫他去「羣英會」中的周瑜一角，扮相一定不壞。經我們說明來意以後，他便滔滔不絕的大放厥辭，爲他的「不抵抗」作了一番辯護。好像丟了東北那樣一塊土地，他毫無責任，應負責者乃另有其人。又一再批評馬占山濫出風頭，好像說明他決不是沒有馬的本領，只是薄而不爲而已。說到他對上海戰事的意見，乃力陳北方的環境險惡，特別小心還來不及，那裏談得到表示態度。造時問他：「假定別人要動，你打算怎樣？」他正色的回答：「我在這裏，那個小子敢動？」我在回去的車上細想：張學良是中國歷史上怎樣一種人物

，安祿山嗎？不像。李存勖嗎？也不像。

吳佩孚住在十錦花園，雖是門前的車馬無多，可是也還不十分冷落。我們坐在他的一間客廳兼辦公室的裏面，覺得和張學良處比較，情形完全兩樣；牆上掛了幾幅亂堂的對聯，雜以他自己畫的幾幅墨梅，可稱銖兩悉稱。桌上有幾本綫裝舊書，顏色已呈灰敗；書傍邊有兩顆黃綾裹着的私章，加上其他文房用具種種。我們正在欣賞之際，一位長袍馬褂配着瓜皮小帽的老年人，已邁步走了進來。客廳中共有客人五六位，乃一致起立，向這位文武兼資的秀才表示敬意。賓主同時坐下，主人便開門見山的首先向我和造時兩個發言：「兩位從上海遠來，爲國事奔走，很辛苦。我是抗日的，有的是兵，缺少的是錢，兩位代表上海各公團希望我打仗，便請兩位回上海後，轉達我的意見，請大家爲我籌款。」我們沒有想到他這樣認真，乃由我發言，對他的清風亮節着實恭維了幾句，並報告了一些淞滬作戰的實況，關於籌款一點，我們原無把握，可是不願使他掃興，乃將上海人民對十九路踴躍輸將的情形，也加重渲染了一番，證明只要能打，錢是不怕沒有辦法的。他似乎頗高興，我們乃興辭而出。第二晚他又約我們去吃飯，見着湯爾和張儂芝一類的人物，畢竟「秀才」比張學良這個「小老粗」要有禮貌得多。抗戰勝利後，我在北平郊外視察一處農場，走他的墳前經過，還下車憑弔

了一番，我知道他一生的經歷，覺得比較其他軍閥究有不同，固不只一飯之德未忘也。

我之認識章太炎先生，也是「九一八」以後的事。其時他住在上海同孚路同福里，我差不多每星期總到他那裏一次或兩次。聽說我的朋友會慕韓，張夢九，宗白華，魏嗣鑾，都正式向他磕過頭，執弟子禮甚謹，我却是馬馬虎虎，僅僅以一個後輩的資格向他去請教。太炎操餘抗土音，最初我不能聽得完全明白，後來聽慣了，則亦了無不懂之處。他畢竟是一個革命出身的學者，每見總喜歡談時局談政治，獨到之見頗多。此外關於明末遺民和他自己一班革命同志的故事，也是他主要的談話資料；前者大概是他革命思想之所自來，後者便是他耳聞目擊或親身經歷的一些事實。其內容往往比較我平日所知道的有些不同，可惜我當時沒有記下來，否則可資參證之點一定不少。我每次到太炎處，總在午後的三四時，其時他已六十以上，可是談鋒甚健，往往能歷兩三小時不倦。湯夫人所備點心，有一種糯米所製的小餅，蒸食，黏性頗大，失之太甜，太炎吃得津津有味，我當然也只好陪着他津津有味。他每次述一故事，不但能記得年月，甚至發生在某一天也並不錯誤，而且說來枝葉扶疏，能使聽者如親履其境，不願聽其中止，湯夫人一再催用晚飯，不聽，我不待其辭畢，也就不敢告辭。

太炎嗜紙煙，往往一支尙餘寸許，又燃一支，我曾看見他三四小時吸之不斷，所吸以美



麗牌爲常，偶得白金龍，便算是珍品。原來他爲人寫字，初無所謂潤格，找他寫字的人，大率即以紙煙若干聽爲酬，因此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本來是不抽煙的，國難後在上海編了半年的日報，編輯所就設在一家同志所經營又髒又臭的印刷所裏，同時因爲人手不夠，往往社論，短評及第一版新聞，都出我一人之手，而且我又一定要看過大樣才肯回家，不抽煙實在不能對付，因此便居然抽上癮了。我出入太炎之門，差不多有三年之久，看見他那樣一種抽去，實在也提高了我的興會，我現在抽煙的成績，大概與太炎的這段因緣是有多多少少關係。

張敬堯在北平東交民巷爲人所暗殺，太炎作了一首小詩：「金丸一夜起交民，射殺湘東舊領軍，爲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一日，我到太炎處，他寫這首詩正屬稿甫就，並把第三句「試問」的「試」字塗去，改了一個「爲」字。我問他「沙門」何指，他對我笑笑說：「古人做詩，也往往有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的，你何必打破沙鍋問到底？」其實我心裏明白，只想看他如何說，他既不肯說，我當然也只好一笑而罷。

翁照垣在淞滬一役，以堅守吳淞得名。當戰事進行最激烈的時候，我請太炎寫幾個字贈給照垣，以資鼓勵，他毫不考慮的就答應了。第二天我去取，他乃交我一篇長文，約千餘

字，並且是親筆用宣紙寫的，我真是大喜過望。（這篇文字後來收在他晚年出版的「太炎文錄」裏面）隨即拿到中華書局印刷所，拍照，製成珂羅版，用道林紙精印三百份，分寄全國各大報館。上海各報雖然是全滯都登了，可是懂得用鋅版把原件影印出來的，却只有天津大公報一家，畢竟胡政之張季鸞是比別人要行一點。有這樣一來，於是照垣之名更大噪於南北，這對於照垣也許是利多於利，可是在我宣傳的技術上看，却是最成功的一幕。其時翁算是一個掛名的青年黨，但我和他並不認識，後來見着，覺得他是一個純粹的軍人，近年聞其隱居港澳間，飽經憂患，他的修養或者更有一點進步了。

當宋哲元以大刀隊在長城抗日，國人頌壯其所爲。一日薄暮，我到太炎處，看見他正靠着窗子檢閱地圖，見我走進，他便問我：「長城竟有這樣多的口子嗎？」我漫應之。私心自，太炎於學無所不窺，且生平崇拜着有「天下郡國利病書」的顧炎午，民初曾一度任籌邊，自己也對關外去看過，爲什麼會發生長城有多少口子的問題呢？

太炎的家庭是很雍雍的，生活不豐不儉，頗稱一個抱道自守者的身分。當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北平龍泉寺的時候，我會讀過他兩封纏綿悱惻的家書，當時湯夫人寫給袁請求恢復太炎自由的一封信，措辭也十分得體，中有「結褵一年，誓共百歲」之語，更足以激動讀者的

同情。我出入他們的家庭既久，看出他們的沈鬱之情甚篤，有時太炎寫字，湯夫人站在傍邊有所批評，甚至指出某字寫得不好，太炎總是笑迷迷的望着她，說：「你不懂得寫字囉！」其實湯夫人不僅詩文不壞，字也是很工整而秀潤的。其時太炎有一個七八齡的少子，韶秀活潑，極端聰明，以時考之，此君現在也應該是接近三十的人了，不知近作何狀。綜括太炎晚年給我的印象，大致「爐火純青」四字足以概之，不只富有人情味，且十分的懂得幽默，其對後進一種殷殷期待之意，使身受者永遠不忘。一日，他問我：「近來看什麼書？」我回答：「正看陳壽的三國志。」他說：「很好，你應該細看裴注。」我近年寫白話也想力求簡潔，得他這句話的益處不少。自從太炎移家蘇州以後，一直到他死，我都不曾再看見他，現在回想起來是追悔不置的。

我和蔣介石先生第一次見面，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的事，事前有一位我在法國認識的朋友，在蔣先生面前爲我吹了一番，大概吹得過分一點，所以蔣先生一定要約我談談。其實這位朋友並不完全知道我，我却早知道他是一個絕頂聰明而結果必一無成就的人！因此他和我談過兩次，我因爲腦筋裏有這樣兩句古文：「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所以總不十分起勁。二十三年五月，蔣先生託他轉我一個電報，約我暑假到廬山一談，我才正式謀之於會慕

韓，慕韓這個人，小事不甚清楚，大事却不糊塗，我記得我和他在上海中國飯店就這件事有過一次的懇談，我對他說：「你既贊成我去，我却有三點必守的原則：一、團體不失立場，二、個人不失身分，三、爲國家之故，可能與國民黨合作，但決不參加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慕韓完全首肯，因此我才斷然有與蔣見面的決定。但我依然覺得，匆匆一見，我一定無法了解蔣先生，因此我又參考過蔣百里（方震）和黃膺白（郭）兩位的意見，可見我對這件事是不馬虎的。

其時百里住在上海的國富門，一天我見着他，對他說：「不久我也許到廬山和蔣見面，我知道他對你很敬佩，却也有一度對你不諒解，你能不能把個人的關係丟開，說明你對蔣先生的認識，給我作一個參考呢？」百里自來是很神氣的，他連忙回答我說：「好，你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他繼續燃着一根紙煙，打開了他的話匣子，對我說了很長的一段話，其緊要的句子，我至今還記得。他說：「全國的大軍人，我幾乎無一個不認識，論到緊要關頭，快刀亂麻，當機立斷，我覺得在全國人物中，無有能出蔣之右者，他之有今天的成功，決非偶然，今後就要看他對全局的規劃怎樣了。」他深深的吹了一口煙，更鄭重的繼續說：「一個人總容易爲歷史所支配，尤其容易爲自己成功的歷史所支配，蔣是以黃埔建軍得到北伐成功

的，假定他用黃埔生用到超過了他們的能力，我便很爲他就心！」當時這一番話，我只是聽了，沒有敢贊一辭。

說到我和黃膺白的認識，也真是偶然而又偶然。當二十二年六月他和何敬之（應欽）等主持與日本簽定了「塘沽協定」以後，頗受到全國輿論的責備。他在由津浦路南返的途中，在火車中讀到時事新報一篇署名仲平的「時局諒言」，這篇文章的內容，是深知道當時對抗日尙無準備，覺得主持這個協定的人，處在那樣一種險惡的環境，還能有這樣一個結果，實在已經大不容易，着實對這班主持人有一些恕辭，而對當時的輿論，獨持了一種不同的態度。膺白認爲是空谷足音，一路打聽仲平是什麼人，可是並無人知道。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問到他的親戚我的好友沈君怡（怡），才知道仲平就是我。於是不久他就拍了一個電報給君怡，要君怡陪我到莫干山去頑頑，其時君怡正任着上海的工務局長，忙得很，又由他懇托了我們兩個共同的好友黃仲蘇陪我去，這大概是二十三年暮春的事，我記得我在莫干山下看見不少的杜鵑花。膺白和我們談了一整天，從他在日本留學組織「丈夫團」參加革命說起，一直說到塘沽協定，不啻是他的一篇小傳。中間有一段涉及他和蔣先生關係的話，頗可注意。他說：「民國十六年清共的大計已經決定，在江西和蔣分手，準備回莫干山，蔣知道北伐快要成

劫，問他對他個人有何意見，他對蔣說：「『士不可以不弘毅』，說到『毅』之一字，你已經太够太多了，今後就從「弘」字上多下工夫吧！」我覺得膺白畢竟不失爲蔣先生的一個好友。

很不巧，我到廬山剛遇着蔣先生生病，我和同去的一位朋友何魯之遊了幾天的山，然後才和蔣先生匆匆的見了兩次，臨別蔣殷殷以通信見囑，我記起百里和膺白對我說的兩段話，覺得蔣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其時廬山正辦着大規模的訓練班，似乎是蔣先生爲着「安內攘外」而正在勵精圖治的時候。我在這裏再度見着黃膺白，也看見楊暢卿（永泰）和陳布雷。

東坡有一首詠廬山的詩：「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一次我雖在廬山盤桓了好幾天，但究竟是不是見了廬山的真面目呢？我自己也不敢說。

## 六 抗日準備時期

(附帶記錄了我二十五年東遊的感想)

從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一役以後，迄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抗戰的揭幕，其間經過了五年以上的時期。在這個五年中，從日本一方面看，是佔領東北以後，繼續發展其侵略，乃至吞併整個中國的準備時期；從中國自身的一方面看，是團結內部，從事準備，以期共赴國難的時期。這期間有幾件大事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

- 一、二十二年春，日本佔我熱河，我方於長城一帶，曾有猛烈的抵抗。
- 二、同年五月中日兩方有「塘沽協定」的成立，關內局勢，得以彌縫於一時。
- 三、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我方自始即信賴國聯必能予日本以集體制裁，國聯對這件事，也確實賣過相當的氣力。二十一年春有「李頓調查團」之東來，次年二月該團即向國聯

提出一詳盡之報告，於我國頗爲有利，除日本反對遼羅棄權以外，居然得了四十二個國家的支持，因而日本不惜自陷孤立，而有退出國聯的宣告。同年六月，國聯諮詢委員會又通過了一個不承認爲「滿洲國」的辦法，並照會會員國與非會員國一律執行，雖說是軟性的，但究不失爲一種維護正誼的舉動。

四、原來日本在佔領東北以後，在二十一年的三月，卽有僞「滿洲國」的成立。最初溥儀還只稱「執政」，到二十三年三月，居然改稱僞「滿洲帝國」，而且改元「康德」，同時，溥儀也改稱「皇帝」；到同年的九月，且居然有所謂「日滿議定書」的出現了。

五、自二十三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底，中日間仍不斷有外交的試探與接觸，其間最可注意的，有所謂「天羽聲明」，「廣田三原則」，「川越張羣的談判」等等，可是都沒有何等成就。

六、此外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二十六年「七七」前夕的「廬山談話會」，都是與抗戰有密切關係的大事，下面還有機會可以提到，在這裏暫不多說。

我到中央政治學校教書，是二十四年春夏之交的事。聽說蔣先生找我的時間本來是較早一點的，但何以延到四月底學校負責者才請我去呢？這當然另有原因，不過我對這類的原



照例不管，因為我本來是一個教書匠，既是請我教書，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到南京以後，第一次見着了惟汾陳立夫劉振東吳挹峯各位，他們說明了蔣先生的意思，我表示上學期的時間已經不多，請從下學期開始，但他們不贊成，於是我只好就這一個多月的時間，來了二十四小時的臨時講演，講題是「近代中日關係史」，演講的地點是大禮堂，聽講的有四五百人左右。那個時候我還只是四十一歲，精力很夠用，每次繼續不斷講三小時，毫不疲倦。講完調閱一部分學生的筆記，知道他們用功的頗多，我對他們發生了興趣，他們對我也確實不壞，這便是我後來在政校繼續教了七個學期的主要原因。前五個學期在南京的紅紙廊，二十七年首都淪陷，學校遷往湖南的芷江，我沒有去；二十八年再遷重慶的小溫泉，因為是周枚蓀（炳琳）主持教務，又拉我去教了一年。其時學生對我的感情更好，常常一大羣的包圍我談天，甚至同出去爬山，在一塊吃飯，也是常有的事。有一位學校當局目擊這種情形，似乎不大放心。因此不敢再請我教了。其實呢，我覺得為國民黨教好一個青年，也和我為青年黨教好一個青年是一樣，可是這種心情，不大容易為普通人所了解，所以我對這位先生的杜漸防微，在某一意義上看，總覺得不失為「忠實」。

二十四年的下半年，一天，蔣先生約談，其時抗日的輿論已漸漸激烈，我提議成立一個

類似的民意機關，以加強團結。蔣頗表同意，問用什麼名義，我想了一下，覺得「國民參政會」還可以。蔣要我擬一個名單，我沒有敢答應，蔣仍要我不妨試擬，但經過兩個星期，我並沒有交卷。後經布雷來催，我不得已提出了四十九個人的名字，除國民黨黨員外，每個人名的後面，還附了一個簡歷。再過兩星期，蔣先生又約在勵志社見面，談到名單的事，蔣說：「展堂先生對憲法有意見，不久要來。我請求他把我所提的名單撤銷，蔣說：『不妨。機構雖暫時無法成立，我仍要個別的約談。』」當即提出曾慕韓，余家菊，王造時三位，要我代約。我告訴蔣先生：余家菊現任湖北通志館館長，請蔣逕電楊暢卿轉約，一定可以來；慕韓在北方，我可轉告；造時在上海，就住在我家附近，可以代邀。後來余果然來了；慕韓則一時不願南下，我又請蔣先生親筆寫了一個信給他，但一直延到二十六年的春天，他才和蔣在奉化見面。造時則因為我對抗日的意見和他太不一致，碰了他一個釘子，後來他在蘇州失了八個月的自由，總算換得了一個『君子』的榮譽頭銜。這位朋友是羅隆基的小同鄉（江西安福），歡喜談政治，領袖慾頗強，但永遠沒有真知灼見，在私生活方面，却比老羅要好得多，看見女人頂多不過笑笑而已，從來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自「九一八」國難發生到二十四五年左右，抗日的輿論一天天趨於激烈，我個人却陷在

一種感情與理智的極端矛盾中。在這個幾年中，我所接觸過的日本人不少，他們的一切想法和做法，我大體明白，二十一年離開中華書局以後，我隨時在全國各處走動；二十四年開始，經常在南京教書，對政府的措施種種，也比從前多知道一點。就國民的情感說，我是一個抗日者；但訴諸我的理智，我却知道中日戰禍一旦爆發，前途一定是凶多吉少，而且是中日兩國共之。我知道一部分激烈的抗日論，完全是出於一種純潔的愛國動機，雖然淺薄，我還是敬佩；另外一部分人，却只想拿着這頂抗日的大帽子去壓迫政府，以求得他們的政治出路，甚至在國民黨內，也還有人借着這頂帽子，在那裏有意無意的進行派系鬥爭，對於這兩派人的行動，我却感到非常危險。中國內部的情形如此，而日本大部分的少壯軍人，又迷信武力萬能，一面却持着他們的政府和他們比較穩健的前輩；一面更對中國繼續高壓，繼續搗亂；這好比火上澆油，我已知道大禍終於是無可倖免的。

到了二十五年的暑假，我決心到日本去跑一趟。這件事得着老友崔萬秋的鼓勵和幫助不少，假如他不願陪我去，我個人是無法完成這一工作的。我去日本的動機，決不想在中日間這個已經形成的大勢有什麼補救，我充分知道自己決沒有這種力量，可是像這樣一件大事，我必須在事前多求得一點了解，以爲我將來相機說話的餘地。爲了籌集旅費和備置行裝，我

和萬秋忙了好幾天，又準備了種種必須的文件，然後才從上海出發。我們的路綫是先到北平，再由天津去門司，而以東京爲我們的最終目的地。

去日本，我必須仰仗萬秋作嚮導；遊北平，我却比較是識途老馬。因爲我在這次以前，至少已去過北平十次以上，雖說每次總只留三五天或十來天不等，但情形究竟比較熟悉。這次在北平住了七八天，因爲沒有多的事，旅費也相當充裕，還找得有其他的朋友參加，因此遊了一個痛快。「舊書不厭百回讀，」我對北平確實有這樣一種感想。一個人假定沒有到過北平，或到過而沒有相當認識，我相信他對中國文化是沒有資格開口的。

日本駐北平的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皖八郎，他在中國做大使館武官的時候就和我認識，我對中日問題的憂慮，他本來是知道的，但這次我和他長談一度，他却對我表示懷疑，以爲我這次去日本，總多少帶得有政府的使命。他問我近來對中日問題的看法如何，我看出他的神情比從前在上海談天時不大一樣，我只好開門見山的對他說：「假定日本一定要把武力大的伸張到關內，我相信中國方面已絕少迴旋的餘地；如果日本還能够懸崖勒馬，暫維現狀，談判之門也未必不可重開。」這確實是我當時的心情。他聽了我的話躊躇了一會，仍表示歡迎我到日本去看一看，並且自動說可以打電報去東京爲我介紹。我始終相信田代在一班日

本少壯軍人中，還算是比較有頭腦的，對中國情形也有較多的認識，態度相當持重，但他的力量在那樣一個潮流中，畢竟是異常微弱，聽說「七七」事變爆發以後，他便暴病死了，其死因我至今不詳。

在現代的交通工具中，就舒適一點而論，我覺得火車不如飛機，飛機不如輪船，這次從天津去門司，過了兩天的海上生活，感到非常愉快。我對日本人的管理和清潔，是無話可說的。船抵門司，湧上一大羣便衣警察，集中向我們兩人盤問，看樣子似乎是早已知道我們的行踪。我們有萬秋流暢的日語，還有多種無可懷疑的文件，他們只好對我們很客氣的放行。門司碼頭，倉庫的整潔，和搬運伙的彬彬有禮，以之與香港，西貢，馬賽等處相比，我覺得西洋人還應該向日本學習。我們這次有四件行李，但搬運伙代我們搬到火車站，並代爲保管。午後四五點再送上火車，總共只要我們日金二元幾角，想起十年前五件行李在馬賽被敲去一千三百佛郎的故事，也覺得日本人是可敬畏的。由門司過海去馬關，輪渡與香港相似，而秩序過之。去看李鴻章當年簽定馬關條約的春帆樓，正遇着修理，謝絕參觀。當時作爲李鴻章行轅的接引寺，去春帆樓不遠，李之被刺，正在這由會場回到接引寺的途中；寺樓一大間，壁上還保存着鴻章贈給爲他治療創傷的那位醫生的詩句，當日鴻章與伊藤陸奧爭辯條約

內容的情景，如在目前，令人不勝感慨。

由門司去東京，坐的一班叫做「燕號」的特別快車，快得真可以；座位上的白布套子，全不見半點污痕；旅客多數靜默，有的在閱讀書報，絕沒有人高聲說話；在我眼中，這就是高度文化。車抵東京，許靜仁大使派人來接，汽車後面，有一塊「中華民國大使館」的牌子，這樣一來，我知道想在東京多找幾個日本人談談，希望已經甚微。在大使館坐了一會，除許靜老外，還看見王凡生，黃伯度，周序生各位，凡生係第一次見面，其餘的都是熟人。使館對面便是日本警察的出張所，聽說連使館中看門的，燒飯的，都可能是日本特派的偵探。許大使開始和我談話，先叫人看看窗子的外邊，並且把窗帘放下，凡此種種，均可反映出日本人的「小氣」。就我平日所認識日本人而論，大抵是熱情洋溢，豪放，嚴肅，在私人的交往上，也富有人情味，男子往往真像一個男子，女人也真像一個女人，假定他們能把這個「小氣」的毛病丟掉，我想日本的民族性，列入現代的泱泱大國之林，是絲毫沒有愧作的。

我這次到日本的主要目的只在增進我對日本問題的了解，至於一般主張對華侵略的軍人心理，我却早已如見其肺肝。我知道中日間的一度大決裂已無可倖免，想謀挽救，也只是枉費心機，我站在一個國民的立場，無法容許日本全勝；站在亞洲及世界立場，我決不願日本

慘敗到不能翻身；我在這個時候惟一可以致力之點，只是如何積累我自己對日本問題的理解，以謀決裂後在重建中日關係一點上，找機會去貢獻我的微力。

住在日本一家旅館的頭兩天，我們深深感到已在日本警察的監視之下，可是他們看見我們滿桌上亂丟着電影院的入座券，寶塚歌劇團的說明書等等，他們似乎也就把監視力鬆懈下來了。結果我們還是跑了不少的地方，見了不少的人，不只外務省文部省我們去過，就連那個日本軍事核心的軍務局也去參觀了一番。我們見着了幾個雄赳赳氣昂昂的軍人，所能激動我內心的反映，只有悲憫！「你們的小勝是你們的小敗，大勝是你們的大敗！」這是我兩句經常對一切來華的日本軍人所說的話，到這個時候我連這個話也不提了。

留東京十天，我嘗試了日本各階層的生活：吃過六元一開頗精美的日本料理，也吃過兩角一開的工人早餐；到繁盛區的銀座去喝過那種有女招待的咖啡，也到文化區的神田去訪問了好多家書店；中間還抽出工夫到過一次橫濱，去熱海洗過一次溫泉；我知道有不少的日本朋友頗欣賞我們的支那料理，可是我在日本弱過，總是以吃日本餐爲原則，甚至連那種在日本留學多年的日本通也不一定歡喜的「沙西米」，對我也成了很大的誘惑，總而言之，除掉日本軍人一定步侵襲中國的一點以外，我幾乎對日本的一切一切都很恭維，我看見一個日本

的少婦，穿了一身濃淡適宜的和服，拿着一柄日本式的陽傘，獨自一個站在海灘上對着那要落不落的夕陽發愁，我會驚奇這是一種我們東方特有的優美！我隨時都在默禱着日本好好保持他們固有的文明，不一定要去染上許多西洋的惡習，遑論今天我們大陸上的「腰鼓」「秧歌」！

從東京回到上海和南京，我已向大家說明，一戰決不能免，所餘的祇是時間問題，惟有儘可能的從速準備而已。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其時我一個人冷清清住在南京青石街青雲里一所臨時的住宅，十四日午後，陳布雷來長談，把他在中央常委會的臨時會議和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的情形，大致的告訴了我，他的神色很不好，表示充分的憂慮，尤其對於明令討伐一層，他不敢苟同；對於蔣夫人要去西安一點，他也覺得非常不妥；問我有什麼意見。我告他，一切須待端納歸來，我們才能下確實的判斷，目前就大體上看，宣布張楊的罪狀加以明令討伐，在政府的體制上，是有必要的，但須做得恰如分際，不可過於認真；蔣夫人能去，祇有好處，決無危險，因為張楊這種舉動，其作用在劫持與恐嚇，以為大家怕了他們，蔣夫人去，反足以奪張楊之魄，使他們了解恐嚇完全無用。此外我又說明宋子文與張學良的私人關係



不壞，宋能一行，當更可迎刃而解。布雷臨走時，對我所說的還是將信將疑，但我却好像有一種靈感，相信我的判斷不錯。

第二天，到中政校上課，學生把我包圍了問長問短，幾使我無法上課，不得已就這個問題爲他們解釋了半小時，除對布雷所說的種種而外，我又增加了幾種理由：（一）張楊是臨時結合，過去並無深切關係，對此事乃以一種衝動出之，未經過深思熟慮，斷難始終一致。

（二）自此事發生以後，全國輿論均不直張楊所爲，對蔣先生乃熱烈擁護，張楊斷不能無所顧慮。（三）政府已明令討伐，軍隊且已調動，張楊又豈能毫無忌憚？（四）閻錫山的電報婉而有力，閻可代表北方的實力派，張楊更何所持？其時我還不知道胡恩來已到西安，更不知道中共所持的態度，但我已堅決判斷蔣先生的安全決無問題。二十五日晚上的八九點鐘，我正在上海新新旅館和兩個朋友談天，忽然聽得五樓上有人放爆竹，叫茶房去打聽，才知道某聞人得着電報，蔣先生已安抵洛陽了。我事前的種種判斷，祇是就常理推測，但張學良居然隨機送到南京，却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

二十六年的春天，我陪慕韓到奉化和蔣先生談了兩次，前年我向蔣先生要過一封邀約慕韓的親筆信，總算有了一個交代。在對外一致的名義下，青年黨必與國民黨保持密切的合作

，也總算沒有什麼問題了。

## 七 抗戰的第一階段

（這裏記錄了我當時在南京和武漢的見聞）

在「七七」抗戰爆發以前，國民黨召集了一個「廬山談話會」，這算是後來「國防參議會」與「國民參政會」的先聲。所約的人方面相當多，包括了共產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及社會的領袖人物。在正式談話的時候，由汪精衛主席，蔣先生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說，以我這十幾年來所聽蔣先生在會場中正式的談話，大概以這次為最重要。有幾句緊要的句子，我至今還記得：「抗戰一經發動，便須不顧成敗利鈍一直打到底，決無所謂中途妥協！妥協就是投降！」（語氣大意如此）當時會場發言的人頗多，尤以東北同胞的語氣為最悲壯，胡適之對國民黨有所批評，曾引起了徐慶譽對他的一場辯論，但結論則對政府的決心抗日是一致贊成的。我在這裏必須坦白聲明：我雖明明知道抗戰已成定局，但並沒有放下我內心的顧慮

，實力太不如人，祇是我顧慮的一端；內部可能因抗戰而有絕大的演變，却是我顧慮的實質。其時我們在會場開會，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秦邦憲却在會場外與國民黨直接交涉，到會的人大抵都不知道。當時何以不讓中共代表出席本會，而必須與他們直接交涉，其特殊意義所在，我是至今也不了解的。

會後回到上海，經過一位朋友的介紹，我和李幼樁（璜）曾在滄洲飯店和周恩來秦邦憲有過一度談話，談話內容不出團結抗日的範圍，他們在廬山和國民黨交涉的情形，當然不肯對我們詳說。幼樁在法國便和周認識，我對他們兩位，却是第一次見面。

上海「八一三」戰爭爆發，我還在上海，一直到八月底，我才前往南京。其時上海的北火車站已經不好上車，我是從梵王渡車站出發，走滬杭路先到嘉興。然後由蘇嘉路轉蘇州到達南京的。當我離開上海以前，日本人還沒有在市中心區投彈，上海市民也不見得怎樣恐慌，等我上了火車以後，所見已經是一片戰時景象。松江附近，一道鐵橋被炸壞了，我們必須手提行李，過橋換車。我在黑暗中提着二三十斤的一隻皮箱，踉蹌踉蹌跌了兩交，好容易爬上了對橋的另一列車。因為避免轟炸，車上不敢開燈，我雖是買的头等車票，在黑暗中居然在三等車箱裏摸索了一個坐位，也就是自以為幸運極了。

我自從這個時候離開上海起，一直到卅五年的一月（即日本投降後四個月）才得回家，我的一個簡單家庭便淪陷在上海八年之久，除兩個較大的兒子先後參加空軍以外（學成的祇有一個）第三個乃不幸在上海自殺了（同濟大學醫科二年生）。其餘一個較小的兒子和一個女兒，都是隨着我的老妻在上海長成的。抗戰使得我的家庭起了變化，影響我個人的生活不小。我到南京不久，便參加了「國防參議會」。這個會祇有二十幾個人，「中共」，「中青」，「國社」，（即現在的民社黨）三黨均有代表，中國青年黨參加的，便是會琦，李璜和我三個。國民黨方面有陳布雷，周佛海，陶希聖諸人。傅斯年似乎是以無黨派資格參加的。國社黨的張君勱，江庸出席甚勤，張東蓀却祇到過一兩次。中共的毛澤東始終未來。這個會由汪精衛主席，除聽取政府的軍事，政治報告以外，會員也提過不少的建議，時間延長了一年，一直到第二年七月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始告終止。

自上海八一三抗戰開始，迄十二月十三日我軍退出南京，爲時整整四個月。儘管淞滬一帶戰事非常激烈，但南京的人心異常安定。敵機會有幾次大舉襲擊首都，我們有時也走入防空壕暫避，有時就簡直站在草地上觀戰。我會親見一敵機中彈着火，頃刻即成灰燼，駕駛員當着火時，即從高空向地面倒下，但不見用降落傘。其時我的大兒子宗短，隨我住在南京，

也目擊這種事實，但不到一個月，他便考入航校了，可見戰爭儘管殘酷，對充滿活力的青年是威脅不了的。

十一月下旬，戰事一天天趨於緊急，政府若干機構，已陸續向武漢撤退。記得我走的那天，是在一個凄風苦雨的午後，車出下關，眼見江岸一種凌亂不堪的情況，感到非常不快。走上民生公司的一條小輪，即發見杜重遠君與我同房。

杜重遠籍東北遼陽，與盛世才同鄉同學，其時甫歸自新疆，行篋中滿貯盛氏贈中央各要人的照片，還有六厚冊油印盛氏治新六大政策的說明，杜本人更寫了一本「盛世才與新疆」的小冊子，對於盛氏治新政績，總算極宣傳的能事了。我於杜君，僅在廬山談話會中見過一次，並在生活週刊上常常看見他的文字，這次和他有五天同船同居之雅，（因為我們上船後，船在下關停了三天）幾乎每天都有幾小時的暢談，我才知道他確是一個有志之士，且學有專長，局度開展，思想也相當穩健，可惜入世未深，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以為憑藉一個盛世才這樣的傢伙，就可以成就自己的事業功名，卒以此蒙不白之冤，死於亂人之手，實在也是抗戰中的一個損失。上船後第二天的早晨，我和杜君走進餐室，又發現黃伯樵夫婦，黃膺白夫人也同在此船，真是喜出望外。伯樵夫婦陪我在黃夫人房裏作過一次長談，從膺白先生

的去世，談到她這次忍痛拋棄留在莫千山的若干社會事業，最後還發表了她對胡適之那本「章實齋年譜」的批評，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再過兩天，我又知道歐陽竟無大師和他的弟子呂秋逸君也同乘此船，我請呂君介紹和歐陽先生見了一面，他給我的印象是氣魄沉雄，精神飽滿，談話時聲如洪鐘，像我這樣一個剛過四十的老青年，對他實有愧色。

到達武漢以後，我寄居在武昌一個妹妹的家裏，一切飲食起居有我的妹妹照料，甚感舒適。其時政府在名義上已遷往重慶，但抗戰的重心却在武漢。戰爭將到半年，法幣還不會貶值，武漢人民的生活如常，秩序絕未紊亂，我每天往來於武昌漢口之間，工作不外開會和看朋友，雖有時也不免有前路茫茫之感，但心境並不怎樣緊張。有一天，和三位姓張的朋友在一塊兒談天，其時正是德國大使陶德曼奔走和平的時候，我們的談話資料，便以此爲主題。三位張姓朋友中的一位，忽然提出一個問題：「假定政府接受調停，和平實現以後，大家對於蔣先生的擁護，是否能和今天一樣？」我一聽，便知道這個問題必有來歷，當即不假思索，提出我一個有力的回答，我說：「勝固擁護，敗亦擁護；戰固擁護，和亦擁護；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擁護到底！」我這個答案，既不是公然主張言和，也不是堅決主張續戰，好像是不着邊際，其實我內心有一個不能變更的決斷：自中日兩國不能戰爭，也不應戰爭，這次

戰爭其所以公然爆發，在日本祇是由於一部分少不更事的軍人所挑起，在中國則是由於一部分別有懷抱的野心者所逼成，就國際的形勢與國內的危機，無論戰爭的結果勝敗誰屬，總是兩敗俱傷，毫無疑義。我個人和我所代表的團體，既無力量發起戰爭，也無力量促成和平，無法不以多數人的意見爲意見，但在我的理知上却是絕對不能上當的。後來政府既不敢變更抗戰的國策，我們當然也祇有擁護抗戰到底。

當我留在武漢的期間，回長沙去過兩次。第一次是二十七年的春天，其時粵漢路的武長段情形還很好，只是車子沿途要讓兵車，比較走得慢一點，我自從民國六年離開我的故鄉以後，僅十五年因送家眷到岳家暫住匆匆回去過一次，實際離開長沙已經是二十年。我整個的童年和青年的時代，都是在長沙度過的，這次遇着這樣一個兵荒馬亂的時期，忽然回到我這闊別多年的釣遊之地，真是感慨萬端：我親戚中的老一輩，多數都死了；一個愛我的姐姐，也不在了；童年時的同學見了一部分，他們大都過了四十；甚至玉泉街一家舊書店的老闆，他是和我有三四年的交往的，也已經作了古人，更使我傷心之至。我生長在一個破落的讀書人家，鄉下無半畝之田，城內無一間之屋，我在長沙度過的二十年，我的家庭不知遷徙過多少次，但大抵不出南門的一角。這次我就那些我所住過的地方，一一巡視了一遍，有的還在



門口張了一張，在窗外望了一望，好像見着我一雙已去世的老父母，依然以笑靨迎着他們的遊子歸來，這個時候已無法抑制我的悲哽，我只好三步當作兩步的連忙跑開，害怕激動我更多的回憶。

其時長沙的市況還很好，南門一帶的繁盛市街，似乎比較二十年前更來得熱鬧，看不出半點戰時景象。南陽街的書店，有好幾家在門口立着廣告牌，大賣其「張主席言論集」，這位到湖南來還不到三個月的張主席，「言論集」居然已不只一本，他大概以爲湖南是沒有文化的蠻荒之地，真是胆大妄爲！

由長沙回到武漢不久，國民黨與青年黨之間，正式交換了一個文件，由雙方的負責者簽名，其主要的意思是共同支持抗戰，也不反對三民主義。這個文件是我起草也是我簽名的，文中有一「與國民黨共患難」云云。我在當時的心情，確係如是。其時陳布雷住在武昌的胭脂井，某晚十一點以後，他以車子來接我去談天，原來是他奉命要我辦三民主義青年團，並把許多有關文件給我看了，我因爲另有黨籍，只好託他代我婉謝。

同年的七月六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正式開幕，這算是抗戰期間的一個民意機關，後來這個會一共召集了四屆，舉行過大會一十三次，一直延到三十六年在南京開過最後一

次大會以後，始告結束。對這個會我是始終其事的，關於會內見聞種種，我準備在下一節裏面詳述，此處便不多說了。

中共分子，自從二十六年九月發表正式宣言，表示共同抗戰，並「願爲三民主義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以後，他們已取得了一個合法的身分，幾乎到處都有他們的人活動。武漢既是抗戰的中心，加以又有參政會的召集，他們來的人當然更多，可是除掉少數表面的人物以外，其餘的我也老大弄得清楚。有一次，爲着歡迎幾個世界學生會的學生，中共發動召集了一個人數頗多的歡迎會。陳紹禹任主席，周恩來秦邦憲等也在場，會場的布置完全是中共的作風，除首先由他們的人說了許多一面倒的話以外，最後周恩來發現我和羅隆基也在場，乃提名請我們兩個說話，說是爲的「換換口味」。從此以後，與抗戰相始終，我和他們在一塊混了八九年，無論他們批評我也罷，或者送幾頂不要錢的高帽子給我也罷，我總一切以「換換口味」視之，絲毫無動於中了。

這個時候集中在武漢的青年黨同志也不少，一部分從正面參加了抗戰工作，一部分則在爲黨服務。我們因爲得着一位湖北同志穆子斌的贊助，慨然把他的一套印報機件借了出來，因而我們在漢口有「新中國日報」的創刊。這個報是我經手籌備的，出版後我還任了二十七

天的經理，然後交給一位四川同志宋瀟波接辦，後來這個報遷往成都，一直支持到這次退出大陸才告結束。在最近二十年中，我一共爲青年黨創辦過三種日報：一、中江日報，欸是廣東的同志籌的，事是我做的，在上海出版，整整辦了半年，錢完了，報停了，我也病倒了。二、就是上面所說的新中國日報。三、中華時報，勝利後在上海出版，我辦了一年多，依然交來同志接辦，一直維持到這次上海淪陷前始告停刊。根據我這三次辦報的經驗，知道在人才與經濟兩方面沒有充分的把握，確不容易支持，一切條件不如人，單靠拿人去拚命，所得的最多不過是一種失敗的經驗而已。

我軍退出武漢是二十七年十月下旬的事。我在離開武漢以前，又回過長沙一次。這次回長沙的目的，是在爲一部分不願入川的同志找一點安頓的辦法，可是結果不佳。這次來往都是坐船，雖得有機會飽看了一番湘江的景色，但心情却是異常沉重。其時長沙的情況已不如前，我會眼見兩個槍斃的搶犯，陳屍於一家金店的門首；還看見一個以間諜罪名綁赴刑場的青年；所謂張主席的「言論集」，不到半年的工夫，市面上也居然看不見了。一幕有名的長沙大火，便是在我離去長沙兩月後的十一月十三日發生的，其時我在重慶的參政會駐會委員會，聯合了幾個參政員打了一個電報給蔣先生，要求懲辦禍首，目的就是要殺張治中的頭，

但結果僅有鄧悌等三人代替了他的一死，他本人不過是以去職了事。後來湖南人有一副罵張治中的對聯：「治績何存，兩個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橫額四字是「張皇失措」。可見輿論是有的，不過政府的用人行政不一定以輿論的是非爲是非就是了。

這次我離開武漢的心情，比較退出南京的時候有點不同：離南京的時候，抗戰還只有四個月，在我實在還看不出未來的變化如何，多少還存着戰爭或可以提前結束的希望，因爲有了這樣一種苟安心理，反而覺得不安；離開武漢的時候不然，知道戰爭一定是要打下去的，一切幻想也就一筆勾銷，既無所謂愉快，也無所謂恐怖，反而覺得心安理得了。

## 八 留在四川的八年

(這裏敘述了若干關於參政會的人物和趣事)

在四川，我有不少的朋友，這次因為抗戰得了一個遊川的機會，而且一住就是八年，却真出我的意料之外。我在四川的時間，大部消耗在重慶，——這個夏天熱得相當可怕的山城！可是因為我一度遊過青城，所以我到了以水利著名的灌縣，又因為遊過一次峨嵋，因此我也到過川南的名城宜賓（叙府）與樂山（嘉定）。工業區的五通橋，我是以一種偶然的機會在那裏住過一夜，竹根灘與五通橋之間的山水結構，大概也是我此生永不能忘的印象之一。我到重慶剛剛半年，便遇着二十八年「五三」「五四」兩度的大轟炸，其時我一個新建的家庭住在都郵街附近的石板街，「五四」那晚的大火，我的家簡直成了火海中的一個孤島，我因為無法回家之故，乃在一座橋上露立了一個通宵。儘管是一種死的威脅，但事後回想，也

有一種趣味；儘管我也把日本軍閥的野蠻看成人類的悲哀，但近代中國人召人輕侮的長期墮落，我也覺得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

因為經過了這兩度狂炸，我不得已遷居在距重慶市區四十里外的冷水場，藉此領畧了少四川鄉居的風味。在我眼中，四川農民的生活是不太苦的，至少我所看見的重慶成都附近和南川綦江一帶的農民，不管是自耕農或佃農，或一家富農所雇用的長工，他們每三天總去趕一次場，除特別農忙的時期以外，他們總要在場上溜躑半天。賣出若干農村的副產品，例如雞蛋之類；購進若干的日用品，例如布與油鹽之類；喫肉在他們也不算是稀有的事。勝利以後，我在江浙一帶和平津附近也看過一部分的農村，長沙的鄉下我也住過，自然，我承認北方的情形是要苦些，但江浙和湖南似乎與四川情形大同小異。農民所最缺乏的是醫藥，教育，娛樂，以及農業技術本身上的改良，「土改」似乎只有部分的需要，而並不是普遍的需。至於煽動他們的階級仇恨，破壞農村的安定力量，究竟對農民為禍為福，我想不久當可求得事實上的解答。

在這個漫長的八年中，我一共去過成都三次，而且每次都住有相當的時間。一方面因為四川朋友的好客與健談，一方面也因為我自己具有多方面的興趣，因此我覺得成都這個地方

最能引起我的許多感想。我以為四川文化最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綜合性，同時四川也是一個把中國民族性搏探得最有力量的地方，而成都尤其足以為我這兩個假設有力的註腳。有人說，成都有幾分像北平，不錯；有人說，成都也有幾分像蘇州，還是不錯；但所謂不錯的地方究竟從那些方面可以看出呢？先舉川菜做個例來說明吧，今天的所謂川菜，實際是奄有中國南北東西之長的一種綜合菜，它之所以能在全國各地造成一個相當地位，原因就在綜合這一點。四川各地的菜都是川菜，但一定要推成都的川菜才是川菜的正宗，這猶之乎山東菜河南菜同屬於北派，但一定要推北平菜才是北方菜的正宗一樣。成都的川菜能够在湯和麵食，點心上考究，這可以說是得了北平菜的要領；能够在炒菜和若干的小食上留意，這實在是富有蘇杭的作風；至於四川的臘味能與湘粵爭長而另具特色，自然更是難能可貴了。我平日有一種偏見：喜歡看一國或一地方吃的是什麼去測量該一國家或一地方文化的深度，可惜我的研究不够深，觀察也不够普遍，否則一定可以說出更多的道理。

說成都像北平也像蘇州，豈只是吃的方面如此，我們進一步去看看成都人的家常生活，成都的太太小姐們那一股子能幹和能說會道的神情，乃至四川人坐在茶鋪子裏擺龍門陣的一種悠閒自得的姿態，又何嘗不可以從北平和蘇州這些地方找出許多類似的例子呢？

我歡喜看戲，什麼戲都歡喜，川戲也不是例外。我懂得成都的川戲比較重慶的，宜賓的，樂山的更够味兒，也猶之乎在北平所看的京戲比較其他各處所看的京戲更够味兒一樣。我相信，假定有人能把中國現代流行的戲劇作一比較的研究，而能說出它離合變化之所以然，一定能對中國文化史提出很大的貢獻。王國維能寫「古劇脚色考」，「宋元戲曲考」，「曲錄」，「錄曲餘談」，「優語錄」這類的東西，真不愧是一代的大師。

無論我或我的朋友，凡是和四川人交往或做過朋友的，都有同一的經驗，即感到幾乎每一個四川人大抵總是健談的，即令他們的誠意偶爾不免爲美妙的言辭所掩，但就我們接觸所及，言語一科，在全國比較起來，總得推四川人第一。這個特殊情形引起我的注意，會細細去研究過構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雖得了幾點假定的看法，但並不敢自以爲是。第一，從若干經濟條件上觀察，四川誠所謂天府之國，生活一般的要比其他各省爲優，生活有了餘裕，自然坐茶館，上公園撿龍門陣的機會也就多了，這些大概都是他們練習語言最理想的場所。第二，四川的知識分子，大抵文學優長，文詞的修飾，實有助於言語的鍛鍊。第三，據說經過張獻忠大屠殺一幕以後，外省人遷往四川的特別多，爲溝通客籍與土著間，及客籍與客籍間的情緒，或泯除彼此的猜嫌，都必須借助於語言，說話的技術使也因這種需要而進步，只要



成了風氣，當然是可以流傳下來的。

成都，不單是食，住，行來得舒服，氣候也異常良好，我每次去成都，總在夏天，就是爲的避免重慶那種酷熱。此外一般的文化水準，成都也確不失爲四川的首善，新舊書籍都很多，有像華西壩那樣的文化區，也有一二條書店集中的文化街，情況似乎比南京杭州等處來得好，我在這裏獲得了好幾種在川刊行的湘綺壇遺著，這是在上海或長沙也不容易買得的。

總而言之，我在四川所度過的八年，除隨時遭受敵機的空襲須走進防空洞以外，我還是从從容容過着正常的的生活，並不特別感到戰時的緊張。我承認共產黨壓迫中國人的本領，確實要比日本人高明得多。

我從參政會所得來最親切的教訓，即民主政治在中國之實現，不僅確有可能，而且實實在在有其必要，就參政會的職權論，固然去現代進步的民主政治還有十萬八千里，然就吾人在當時運用此僅有之職權所生的影響，則吾人雖欲否定此八年餘參政會之繼續舉行，說它不是中國民主政治實現的初步却不可得。參政會共有決議，建議，詢問，調查四種權限，（調查權是三十二年第二屆所補充的）把這四種權限聯貫使用，乃居然對於監督政府一點，發生了相當的作用，所謂「決議權」雖多少近於形式，但政府對內對外的施政方針，究竟不能不拿

出來把人民的代表看一看，同時參政員看了這種方針，也不能不動一動腦經。如果發現其中有過度的不妥當，當然也可加以修改或補充，政府不接受這種修改或補充，即很難取得參政會的決議，而使這種方針成爲確定。除掉修改或補充政府的施政方針以外，參政員也還有一種「建議權」，這種建議權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只要認爲於抗戰有益或民生有關，乃至其他一切爲政府施政方針所不及而參政員認爲有必要者，幾乎無一不可建議。對於這種建議雖經參政會或駐會委員會予以通過者，政府仍可置之不理，可是假定在性質上確實重要，爲多數參政員所共同提出，又得着輿論的有力支持，政府却也不敢忽視。至於「詢問權」的行使，那更增加了參政會的權威不小。歷屆參政會的大會，大率以開會十天爲原則，只有第三屆第三次的大會開了半個月；第四屆的一二三次大會都開了兩個星期。在開會期間，政府人員對於報告是不怕的，因爲橫豎有秘書們替他們把報告的稿子擬好了，只要上去念一遍就算了事。建議也不在乎，有有建議在你，執行不執行在他，原沒有一定的拘束力的。惟獨詢問權的行使，却是政府中人所最頭痛的。每次大會進行到詢問一階段的時候，無論是行政院長或各部部长，幾乎無一不誠惶誠恐，惟恐答覆一不得當，即與他們個人的顏面有關，甚至像宋子文孔祥熙在當時那樣炙手可熱的人，一經知道有幾十位參政員要向他們提詢問，便立刻

得黯然無色！每次大會的詢問案，大率集中在軍事，外交，財政，交通等幾個重要的部門，其餘的則屬於次要。答覆詢問的方式，分「口頭」與「書面」兩種，口頭答覆無異於對參政員的全體公開答覆，同時也表示這位部長對部務相當熟悉，因此最受歡迎；書面答覆等於對提詢問者的個人答覆，也表示這位部長對部務不大關心，因此很難引起大家重視。我記得三十六年五月，第四屆第三次大會在南京開會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參政會擔任農林部長，過去聽人報告者，現在也得向人報告；過去以詢問審人者，現在人亦將詢問審我；可是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恐慌：第一，農林部畢竟是一個冷門，多數的中國人並不懂得農林事業應該特別注意；第二，參政會是我的娘家，大多數的參政員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他們一定要爲這位初嫁出的姑娘捧捧場，決不會有意的審我；第三，閉會的時候，我接事剛剛十天，無論報告或答覆詢問，都無異是代我的前任服務，即有不週到的地方，我想也容易得人原諒；第四，我在接事以前，對農林部的內容，經過三星期的調查，接事以後，我又有十天的研究，即令有人要詳細問我，我也確實能把中國的農林現狀說出一個大概，而且不會十分的外行。等到那天我正式登場的時候，我僅僅只把部內各專家代擬的一份報告作爲參考，而把我自己花一個月工夫所了解的種種，另作一種口頭說明，參政員們所提的三四十條詢問，我也即

席作了口頭答覆，有少數問題我還不能解答的，我也老實告訴他們我還沒有弄清楚，留待將來在駐會委員會補充，就像這樣，我居然很輕鬆的把出席參政會這一幕應付過去了。從這裏我得了兩點很小的教訓：即一個從事實際政治的人，最好是由議會出身，要在議會中真能發生力量，也必須幹幹實際政治，然後民主方式的運用始能圓活；其次，則一個人假定對政治有相當誠意，用不着害怕民主，毋寧應該歡迎民主，惟有從一個民主方式所得來的助力，才是一個政治家真正的助力。至關於「調查權」的行使，則由參政員組織了一個「軍風紀調查團」，一個「川康經濟調查團」，對前方軍風紀的整頓，與後方經濟情況的考察，均具有相當成績，如參政員梁上棟因參加「軍風紀調查團」之故，在前方被敵機炸去了一條膀子，更足證明他們的異常盡職。

第一屆參政會是議長制，最初半年由汪精衛任議長。汪的長處頗多：才思敏捷，文字優長，言語便給，態度大方，應付週到；短處則爲自視太高，不能容物，見事欠深刻，應事欠穩重，而愛出風頭，愛爭閒氣，抓不着重點，尤爲一般文人最普遍的毛病。至於主張和平一點，無論他是主張於廬山談話會以前，或抗戰一年以後，只要他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假定他是從內心深處的誠意出發，反而無大損於他的人格。

汪從重慶飛往昆明，是廿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他從河內發出主張和平響應「近衛聲明」的電報，則爲同月的二十九日。至汪出走的動機究竟起於何時，行前的布置怎樣，乃至後來南京偽組織的經過種種，我至今還是模模糊糊。但有一我親見的故事，却值得一述。大概就在汪出走之前的三兩天吧，他忽然約了八九位參政員到他家裏晚餐，我也是被約去的一個。在坐的除羅文幹曾慕韓范予遂等三數人外，其餘的我已記不得了。這一晚汪在席上，依然是談笑風生，毫無異態，並且拿他久藏的法國葡萄酒出來享客。他說：「有一種人，平日自奉甚奢，等到待客的時候，却故示儉樸，實在是一種無聊的虛偽！」汪故患有嚴重的糖尿病，這一晚，他不僅大喝其葡萄酒，且親自操刀爲客人分配蛋糕，自己也吃了一大塊。有人笑他「你大概是因爲夫人不在，才敢於這樣大吃大喝啊！」汪但笑不答。汪平日送客，照例到大門爲止，這一次却是且送且談。一直送到馬路邊，看客人上了車，他才退回去。當時我頗詫異，及至聽到他出走的消息，才恍然大悟。

湖南的老教育家胡子靖（元倭）先生，我是從參政會才和他發生一個時期的交往的。胡先生以辦明德學校著名。同時這個學校也就是他畢生心血之所貫注。明德創辦於清季光緒二十九年，光緒三十三年，我才進長邑高等小學，長邑的校址在長沙城北的荷花池，去明德不

還，我到明德去參觀過好幾次，覺得那裏的規模和設備，要比長邑的好得多，心裏非常羨慕。這個時候長沙的私立學校，以明德，修業，楚怡，周南爲最有名，稍後乃又有廣益，嶽雲，藝芳等校。長沙教育界的風氣，大率以這些私立學校爲轉移，其所造就的人才之多，也往往爲公立學校所不及。因爲這個時候，外患日急，風氣已開，興學育才，人民已能自動，用不着政府多加干預，而胡先生便是這種自動起來辦理教育的一個代表人物，湖南之有胡子靖，正好比江蘇之有張季直。民國十一年，我在上海見過胡先生一次，其時他剛剛五十，精神異常飽滿，爲明德籌款，正將有南洋之行。二十七年，他到了漢口，應政府聘，任了一名參政員。二十八年，隨政府西遷，遇着「五三」，「五四」敵機的轟炸，他便移居在重慶的人和鄉，隔我的居處不及一里，因此我常常有機會向他請益。其時他已年近七十，體力就衰，但仍神完氣足，每見必長談，每談必及明德，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之於明德，庶幾近之。他把他的詩集「耐盦言志」兩冊送給了我，凡他從光緒丙午到民國己卯三十餘年間所作的詩，都收入在這個集子裏面，而十之八九，也無非敘述他辦理明德的困苦艱難。嚴範森先生在他詩集上的題辭說：「立懦廉頑，百世下猶當興起，」我把他的詩全部讀過一遍，也確實有這種感想。

江蘇張仲仁先生（一塵）也是參政會裏一個可愛的老人，他本來是袁世凱的親信，曾任機要局局長，可是對於袁氏的稱帝，他却絕對不肯苟同。抗戰進行到兩年以後，我曾向當局建議，設立一個編纂戰史的機構，把一切有關抗戰的史料一一搜集起來，作為編輯一部完備戰史的準備，可是沒有為當局採納。後來仲仁先生在參政會有一個這樣的提案，所舉理由更為詳盡，雖然在參政會通過了，也依然束之高閣。現在距日本的投降已五年以上，中國當時在抗戰中所處的地位，已不復為世人所重視；即在一般國民的心目中，也若存若忘，致政府對於一切一切，都沒有一個根本打算，真令人慨歎不置。

馬君武（原名和）與羅鈞任（文幹）兩先生，同為留學界前輩。馬籍廣西桂林，早歲即參加革命，其學以治科學為主，對文學亦極有興趣，所譯羅倫「哀希臘」一詩尤有名；亦偶譯西洋短篇小說和戲劇，我讀過他譯的一篇托爾斯泰的「綠城歌客」和一本席勒的「威廉退爾」，印象甚深。民初曾任南京臨時政府農商部次長，一度任廣西省長，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國會以反對對德參戰攻擊梁任公甚力，中山開府廣州，他曾做過秘書長，雖畢生與政治為緣，但從未放棄他的學者生活，所譯科學名著，在商務與中華出版者甚多，盧梭「民約論」譯本，也出自他的手筆。他出席第一屆參政會時，已過六十，但仍精神飽滿，開會時每歡喜

與褚輔成（慧僧）辯論，因爲他和褚同爲民國初年國會中的老鬥士也。他的大兒子葆之，留美學農，曾任農林部農業經濟司司長多年，我與葆之共事年餘，得其助力不少，學不如乃父之博，精明強幹，殆又過之，現仍服務於臺灣農復會。

羅鈞任籍廣東番禺，專治法學，有通識，曾任北京政府財政部長，南京外交部長，而布袍粗食，不殊寒素，蓋與君武同不失舊日書生本色也。在參政會，非重大問題不發言，偶一發言，必爲全場所傾聽。開會完畢，必汲汲覓機飛昆明，不願多所留滯，因爲他在任參政員期間，同在西南聯大教課，任羅馬法講座也。他的經歷相當豐富，也歡喜談天，在開會期間，一有機會，我總找他長談，例如金佛郎一案的事實，中蘇復交的經過，他個人在新疆所遭遇的危險，都源源本本和我談過。有一次，我和他應上清寺某一友人之約，因爲時間尚早，乃在附近一咖啡館中間談，他說：「從前在曹錕時代曾任要職的某君，當時的輿論幾一致說他要錢，其實決非事實。」他並以加重的語氣說：「處在一個最容易要錢的地位，而確實不要錢的，殆莫如某君。」所謂某君也者，我後來在上海也曾見過一次，確曾看見他出賣其先人所收藏的字畫以維持生活，可見鈞任對人物的批評是不肯隨俗苟同的。又據一與鈞任最接近的某君告我：汪精衛在重慶出走以前，曾一再懇求鈞任爲他辦理英美外交，但爲鈞任所婉



拒，可見他對於自身的出處，更是不肯苟且的。

張伯苓也是對參政會始終其事的一人，我因為與他同在主席團的關係，常有機會和他接觸，可是在八年的時間，我大概不會同他談過十句話，並且每次輪着他當主席的時候，我總要爲他捏一把汗，因為他那一套無意義無內容的講話，實在是我所最怕聽的。大陸淪陷，他稱病留在重慶，但不久却又回到天津，最近死了，香港報紙上有過幾篇追悼他的文字，但我只看了題目，沒有看內容。我相信，假定我也是一個南開學生的話，我決不會受他的任何感化。

主席團有一位老小姐吳貽芳，因為她當過多年的金陵女大校長，當主席的成績確實不壞。南京「解放」後，她忽以靠攏聞，別人以爲奇怪，我是半點也不奇怪的：第一、也許她把那點教育事業看得很重，捨不得離開；第二、她根本不懂政治，更不懂什麼是共產黨；第三、我會親眼看見她受過某種刺激，女子的心地畢竟很窄，她大概沒有忘記；第四、參政會某次以車子接我和她赴某種宴會，先接了我，再轉到某處接她，我在車上足足等了半點鐘，她才姗姗而來，車門關上，一種香氣，實在把我的頭腦沖昏了！一個願意獻身教育而不肯結婚的人，乃如比的愛修飾，似乎有點不近人情；有這樣四種原因，靠攏還有什麼奇怪呢？某次

參政會開會，某君以吳貽芳余家菊高惜冰張肖梅四位參政員的名字作成一副對聯：「常貽芳澤憐家菊，自惜冰容號肖梅。」頗爲一時傳誦，我因爲聯想到那次汽車上的香氣，也覺得「芳澤」兩字，確有根據。

有一個問題，原與政治無直接關係，與抗戰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可是每次參政會開會，幾乎總要大鬧一場，照例又鬧不出結果，便是中西醫之爭。祖中醫者，以孔庚爲首領；祖西醫者，以傅斯年爲巨擘；彼此各執一辭，咻咻不已，一定要吵得面紅耳赤，才以不了了之。我細想，像這樣一個問題，何以會提到一個研討政治軍事的機構裏面來辯論呢？我假定的答案是這樣的：所謂中西醫之爭，確乎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由於中西思想根柢上有了絕對不同的差別，乃形成兩種絕對不同的醫病方法，辯論者表面上是在爭中西醫，實際上却是各自在擁護自己思想上的立腳點，所以才爭得那樣起勁。孔庚去年在武昌爲應付共產黨的公憤，抗節不屈，絕食而死。傅斯年今年在臺灣省議會答辯質問，突患腦出血去世。現在我回想他們兩位在當時參政會的聲音笑貌，覺得他們都是很認真而極可愛的人物。

## 九 記民主政團同盟與延安之遊

（這裏敘述了我與若干中共首腦人物的會見）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是民國三十年發起的。其直接的動機，係由於政府將若干不必除名的參政員一律除名了，大家覺得與團結抗日的宗旨不合，與推進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發起這樣一個團體，以表示抗議。同時也覺得國共兩黨間的磨擦一天天趨於深刻，也必須有一個這樣的緩衝力量，以保持對外陣容的一致。最初參加發起的，僅張君勱梁漱溟黃炎培章伯鈞和我五六人，救國會分子並不在內。黃炎培最初是很熱心的，不僅他自己加入，並且要他的幾員大將如冷禦秋江問漁楊衛玉等也同時加入了。他捐過一千塊錢，擔任過第一任的主席，但不久他聽了某閩人的一番勸告，乃在他們的機關雜誌「國訊」上發表一篇文章，說他與這個團體並無關係！我們素來了解他的性格，也只好一笑置之，改推張表方（瀾）

任主席，由我擔任秘書長。其時張表方住在成都，我們都住在重慶，表方除負一部分籌款責任，遙領了這個主席名義而外，並沒有多管事，關於盟務的推進，差不多由我和君勳伯鈞幾個人頂着幹的，最初一二年，進行相當平穩，選擇盟員也異常審慎，所出版的機關雜誌「民憲」半月刊，除強調民主一點而外，涉及實際政治的地方不多，因此國民黨最初原有對「民盟」的一種不安情緒，也逐漸銷釋於無形了。其時在重慶的中共代表人物如董必武王若飛周恩來秦邦憲等，雖與「民盟」方面有所往還，但大體上還能够尊重「民盟」第三者的地位。自從救國會分子沈鈞儒張申府史良劉清揚鄧初民等加入以後，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後成立，活動的範圍加廣，盟員也逐漸加多，「民盟」乃隱然成了一個政治力量，在國際上也引起了相當的注意，於是好奇者，投機者既蜂擁而來，盟員乃一天天趨於複雜，中共想利用「民盟」作爲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趨於明顯了。這個時候主持昆明支部的爲羅隆基曾昭掄聞一多季公樸諸人，他們覺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團」兩字，對於以個人資格參加者頗感不便，因提議取銷「政團」兩字，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同時還有把「民盟」變成一個獨立政團的醞釀。其時「青年」「民社」兩黨分子，參加「民盟」的已經不少，他們只願保持一個促進民主的原有旨趣，不願看見「民盟」淪爲任何一個黨派的工具，因此經過最後一次大會的爭

論，青民兩黨乃先後脫離，從此以後的「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面倒」，再沒有其他的第二條路可走了。

三十四年的七月，我和褚慧僧（輔成），黃任之（炎培），冷禦秋（遜），傅孟真（斯年），章伯鈞六人曾去過一次延安。本來王雲五也約定同去的，臨時因病作罷。沈鈞儒張申府最愛湊熱鬧，很熱烈的要求同去，因為沒有得着某方面的同意，也沒有去成。

我們這次前往延安，當時有許多人以爲是由政府發動，其實我們既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參政會，（雖然我們六人都是參政員）完全是一種私人行爲，政府不過默許而已。從另一方面說，美國大使館却是特別幫忙，我們來回的飛機，都是赫爾利大使爲我們調配的，臨行前我們還和他談過一度，他對我們此行，頗寄以甚深的期待，以爲必於國共關係的改善有益。至於中共方面，確曾表示相當的歡迎，並且還指定王若飛陪同我們前往。

當我們在重慶出發的時候，大家並沒有一定的腹案，不過知道去勝利已經不遠，如果國共間的糾紛不求得一個適當的解決，必定於國家前途沒有好處。我們也充分知道我們並不能解決問題，但覺得對中共的實際情況能增加一些了解，也未必於解決問題無益。

我們是七月一日出發的，五日便依然回到重慶，在延安一共住了四晚。當我們的飛機越

過秦嶺一萬四千尺的高空而抵達延安機場的時候，共方人物自毛澤東朱德以次，幾乎是全體出迎，態度相當親切。機場上似乎沒有任何戒備，有二三百個老百姓都遠遠的站着，以一種好奇的眼光，歡迎我們這一羣天外飛來的遊客。還有幾個小孩，看見毛澤東走來了，高舉右手，叫一聲，「毛主席！」我還是二十年前和毛在上海見過兩度的，沒有想到他居然有了這一股子神氣，看了那樣一種排場，在我腦子裏忽然聯想到另外一位老朋友——宋公明先生！

歡迎式完畢，我們便被一部破舊的客車，一顛一播的，送到了十八路軍總部。其餘歡迎的人員都先後趕來，充滿一間不大不小的客室。葉劍英——十八路的參謀長——着一身灰布衣褲，提出一把開水壺，繞室一週，沖茶敬客。大家向我們問長問短的寒暄了一會，就在他們的總部午餐，餐畢，被送到招待所休息。

招待所是一排十來間的平房，前面有一塊很大的草地，陽光充足，空氣新鮮，設備雖異常簡單，打掃得却十分清潔。招待我們的幾個青年，連同那位招待主任，也還彬彬有禮，招待所的廁所是幾個土坑，可是裝得有紗門；地下洒了不少的石灰，絕少蒼蠅蚊子之類，可見他們頗講究衛生，志不在小。

我們的休息還沒有開始，毛澤東便派人帶來了一個裁縫，說：「延安的天氣不比重慶，中午雖然頗熱，晚間却要蓋被，各位帶來的衣服不多，恐怕要受涼，所以叫裁縫爲各位做一套夾衣。」夾衣要一兩天才能做好，又預先爲我們每人配給一件毛絨短衫。據說織衣的毛絨，和做衣的呢子，都是延安土產，總算難爲他們。

所謂休息，便是大家睡了一覺，在用過一頓頗爲豐富的晚餐以後，我們六個人便開了一個非正式的會議，商量明天談話所應採的態度，我們既沒有負得解決具體問題的使命，當然只是從原則上着想，同時也想多聽聽他們的意見。

一宿無話，第二天午後，雙方便舉行了第一次的會談。共方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祖涵，張聞天，王若飛，葉劍英，任弼時等出席。除談到國共已往交涉的經過由周恩來補充了幾句，談到軍事方面由朱德補充了幾句以外，其餘的時間都是由毛澤東發言，十足表現一種獨裁的氣概。雙方所談均非常廣泛，共方更附帶發了不少的牢騷，沒有作出任何結論。在他們這幾位出席的當中，在我只有朱德，劉少奇，任弼時三人是這次才認識，其餘都是熟人。張聞天有十幾年不會見面，但沒有老，和在中華書局與我同事的時候差不多，像這樣的談話，隔兩天又舉行了一回，這次却比較正式一點，有記錄，有結論，但無非就政

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這類原則上立言，既不實際，也不具體，所以雙方並沒有發生任何爭執。大概毛澤東也知道我們只是來「探行情」，決不是來「講生意」，所以我們的正式會談很輕鬆的便閉了幕。回到重慶以後，這份談話紀錄，由褚慧僧很鄭重的交給了蔣先生，可是並沒有任何影響，既沒有被駁回，也沒有被採納。但是從某一意義上看，我們這次的延安之行，究不失為後來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個前奏。

我們到延安，剛剛適逢中共的七中全會閉幕，他們各方面的文武幹部來開會的很多，都還沒有散，因此他們利用機會，分作三天正式的招待我們。第一天由毛澤東出名，所約來陪客的，都是黨方的高級人員；第二天由林祖涵出名，所約的都是延安邊區政府的高級幹部及一部分地方人士，連那位「勞動英雄」吳滿有也包括在內；（時林任邊區政府主席。）第三天朱德出名，來的都是軍方人物，重慶派駐延安的兩位軍事聯絡員也被邀作陪。每次都有十桌以上，在延安大約是難得的盛會了。

在這三次宴會中我所得的印象，覺得他們軍人的質素，似乎比文人來得好，朱德也似乎比較毛澤東沒有什麼做作。我從傍得知，朱德住在延安已經有了四年，這大概是毛澤東的一種作用，一定要把朱德拉在一塊，他們的黨政軍才比較容易一元化。要由「朱毛」並稱過



度到毛澤東的獨裁，似乎也非經過這樣的一個時期不可。

在軍方請客的一天，我這一桌都是幾個湖南人，我坐客位，彭德懷坐主位，除賀龍，蕭克，蕭銳光外，還有幾位我已經舉不出名字了。入座後，彭德懷客氣了一番，說：「延安地方很偏僻，一切都很簡單，凡事要請各位指教。」我藉着這個機會，順便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在這裏住了三天，參觀了不少的地方，見了不少的人，覺得延安是貴黨的中樞所在，包括你們的黨員，公務人員和老百姓，總共不過五萬人，政令比較容易貫徹，假定一天，你們的環境變了，人多了，你們有什麼方法保證你們的一切做法不會變質？」彭答覆得很快：「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過問政治，政治又不能約束軍人，我想每一個軍人都是會要變成軍閥的！」由現在想來，他這個話還是大致不錯，可是所謂「老百姓過問政治」一點，以今日大陸上的殺人如麻，敲骨吸髓，真不知從何說起啊！

除掉三次正式的宴會以外，他們還來了一次歡迎我們的晚會。晚會的主席是李富春，（湖南人，留法勤工儉學生，也是蔡暢的丈夫，蔡暢便是蔡和森的妹妹。）周恩來發表了演說，客人中則由黃任之和我說了幾句話。演說既畢，便來了一回低級趣味的秧歌，兩幕簡單的話劇，最後的壓軸乃是一齣梁山泊故事「三打祝家莊」的京戲。京戲演得不壞，聽說演員和

行頭都是從山西得來的。毛澤東根本就是一個中國小說和戲劇上的人物，他在這一晚，一直陪我們看到終場。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黨部，十八路軍總部，邊區政府，各有一個戲台，可見他們對於戲劇看得很重。當然他們也利用這些場所，作爲他們開會的會場。

在招待所有一間會客廳，我們除上舉的談話會宴會和晚會以外，其餘的時間，大概都用於會客。客人是我們指定的，經過中共通知便都到招待所來找我們。有一位幾乎每天都來，而又和黃任之冷禦秋兩位談得最多的，便是陳毅。陳是四川安岳人，勤工儉學生，當過重慶「新蜀報」的編輯，能謔幾句打油詩。李璜教過他的法文，我在重慶會見過他從蘇北寫給李璜的信，字是不行的。除掉「擺龍門陣」的本領和一般四川人差不多以外，看他那一股幹勁，却也不失爲「四眼狗」，「豹子頭」一流的人物。他說他在抗戰中曾帶過兩傷，我問他這次到延安如何經過敵人的防綫，他說有方法可以通過。這個時候他已是半個江蘇的主人，黃冷兩位所以熱心和他攀談，大概都是爲着江蘇問題吧。聽說他在黨內最和周恩來接近，目前在上海的作風也比較其他地方微有不同。假定中共在韓戰中一敗塗地，更假定台灣在半年內即開始反攻，他究竟做一個身殉「太平天國」的陳玉成？還是做一個火併王倫的林冲呢？

在這裏我所見着的中共女黨員有蔡暢，鄧穎超，丁玲，陳學昭等幾位。蔡是中共的中委

，鄧是候補中委，這個時候中共一共有七十幾個中央委員，女性却只有這兩位，至少在中共內部男女是不大平等的。丁陳兩位，和我們有過長時間的漫談，丁玲老了，但仍十分健談，在延安所實行局部的配給制，我是從丁才得着一個大概的。據丁說：他們的黨員和公務員，都是實行徹底的配給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紙和婦女用的月經紙，都是由公家配給的。病人與產婦和嬰孩，還可能酌配雞蛋牛奶之類。他們吃的是大廚房的大鍋飯，只要憑着一種飯票子，走到任何一個機關去吃飯都不必付錢，一切機關的東西，都是由公家領來的，機關與機關之間，便憑着這種飯票子核算，由公家統籌支配。不過他們還是有一種保健飯，營養的成分要高些，這是爲少數特殊人物而設的。他們的每一個工作人員，每月仍可領得極少數的錢，文人寫稿子，也可領得若干的稿費，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個小小的市場，有各種雜貨店，還有幾家小館子，可以自由買賣，自由吃喝，各人有少數的錢並不是沒有用處的。

傅孟真所找來的客人，大概是「抗大」的教員之類，也有携帶著作向他請教的，也許他們是北大出身或與中央研究院有過關係的。

秦邦憲任延安「解放日報」社長，這是延安唯一的報紙，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張，內容單

調，他們辦報紙的目的不是在多得消息，而是在藉報紙封鎖消息，這可說是共產黨的不治之症。我問秦邦憲：「你回到延安來怎麼胖了許多？」他想了下回答我：「我們在這裏不用甚麼腦經！」這個答覆很有趣：連秦邦憲也用不著動腦經，其餘的人更可想而知了。

我問徐特立：（湖南人，留法勤工儉學生，我住長沙師範的時候，他任校長，在中共黨內仍担任教育方面的工作。）「近來幹什麼？」他說：「計劃編一種教科書，是把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等混合來編的。」我問：「延安有圖書館沒有？」他說：「書籍不少，但分散在各個研究機構，並沒有一個像樣子的圖書館。」我常聽說董必武周恩來有在重慶買書帶回延安的事，我相信他這話是真的。

除了來看我們的客人以外，我們也出去看了幾個人的家庭。周恩來的家庭最整潔，雖然是一個窰洞，可是窗門几淨，圖書擺得整整齊齊，周太太鄧穎超，照她幾年在參政會的表现，我知道她是一位沒有內容的女權論者，可是就她的家庭情形論，却不失為一位良好的太太，就是不生小孩。

我們向毛澤東要求，要看看陳紹禹，因為我們在重慶聽了許多關於陳的謠言，想知道一個究竟，見面的結果，覺得這些謠言不為無因。據陳說：他確實病了很久很久，而且很厲害

，一共打過一千多針，一直到我們看他的時候，他才能穿着棉衣棉褲，在房門外邊走動走動。房裏除一床一桌和幾張矮櫈以外，別無長物。看他的太太和小孩的樣子，似乎是營養不良，保健飯未必於他們有分，甚至有人揣測他們是從另一地方被搬來給我們看的。陳能說流暢的俄語，我和君勳與鮑格莫諾夫見面，他爲我們當過翻譯。有常識，能演說，在參政會頗能表現一種鬥爭精神，領袖慾似乎很強，但經驗與手腕，都鬥不過周恩來，自然更鬥不過以陰狠見長的毛澤東。我們這次和他見面的時候，他已經是百鍊鋼化爲繞指柔，什麼英雄氣概也沒有了。

張聞天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我的老朋友，老同事，因此我也向毛提出，要和他談談。毛命令他的親信任弼時，同我去，於是我們只好談談私人間的往事，不及其他。張住的地方和陳紹禹差不多，但桌上多了一架電話機，還擺得有幾本書，與從前和我住在上海民厚北里時候的情形比較，不如遠甚。張少年時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了。當時傳說：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都是所謂國際派，是毛及其親信所不信任的，秦早死了，陳張也至今無表現。張被任命爲出席聯合國的首席代表，但周恩來知道，這是永遠沒有到任的一天的，臨時有事向聯合國交涉，也還是叫伍修權去，決不叫張聞天

去，這並不是表示中共的人才之多，只是說明中共內部有種種爲外人所不容易了解的事實。（我寫到這裏停了兩天，已看見中共任命張聞天代王稼祥任駐蘇大使的報導，可見國際派終於要普遍的抬頭，民族派再想左右支吾也不可能了，因爲這是最近蘇俄允許有限度援助中共的交換條件之一啊！）

在我們離開延安的前一天——七月四日，毛澤東特別要周恩來通知我和章伯鈞，說他要邀我和伯鈞到他私人住的地方去吃午飯，並且可作竟日之談，我的目的本是要來探探行情，同時也想進一步研究研究毛澤東這個人的，既有這個機會，當然是欣然同意。毛住在延安城外的延園，（原名棗園，不久以前才改的。）這一天除毛和我們兩個客人以外，還有周恩來和朱德，從早上九十點左右談起，一直談到下午的四五點左右才走，真可算得是一夕長談。談話的內容異常廣泛，甚至連水滸和紅樓夢，乃至我的「萬竹樓隨筆」，毛也發表了他的批評。朱德也說了不少的話，我始終覺得他是一個老實而樸素的軍人，貌似李德鄰，而甚重過之。談到時局問題，毛很激越的說：「蔣先生總以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話，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謂也。）談到美國，他說：「我這幾條爛鎗，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

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毛有這一股子湖南人的蠻勁，我是早知道的，所以並不覺得奇怪。我以一種輕描淡寫的態度對他說：「假定蔣先生約你到重慶去談談，你去不去呢？」「只要他有電報給我，我有什麼不去？」他回答得很爽快，很自然。後來他居然到重慶去演了一齣「黃鶴樓」，雖說是由赫爾利做了他的「趙子龍」，張治中做了他的「魯子敬」，但最初的動機，也許是由於我這個無意中的提議。

我們在延安還參觀了一個收容俘虜的「日本工業學校」，大概收容了好幾十個日本人，雖以工業爲名，但我們却沒有看見任何關於學習工業的設備。我們進去的時候，看見一二十個日本人正在搬運土磚蓋造一座簡單的禮堂，他們一面工作，一面唱歌，似乎很快樂。後來又在另一間房內，看見幾個新自前方解到的日俘，却一個個橫眉豎眼，表示滿肚皮的不高興。任這個學校校長的日人名岡野進，實際便是今天日共中的有名人物野坂參三，他在日共中的地位，僅次於該黨書記長德田球一。他穿着西裝，四十左右，姿態確像一位校長。他爲我們開了一個簡單的茶會，我們向他問了許多關於這個學校和學生的情況，大概只是一個訓練日本共產黨的機關而已。聽說還有一個專供收容朝鮮俘虜的學校，我們沒有去看。

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蘋的，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七月五日那天我

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着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來送我們，兩隻美秀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一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個遺憾。」

總而言之，我這次的延安之遊，所得的印象甚深，我承認他們是在那裏苦幹，關於組織訓練，他們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辦法；像延安那樣一個貧瘠之區，他們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創造出許多爲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也算難得。可是從延安一般情況所表現的，有一個不容易補救，而且爲他們自己所不肯承認的毛病，便是一個「陋」字！他們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聞」，也只好「因陋就簡」，可是一個不幸的機會來得太快，就要他們統治全國，就逼着他們參與世界問題的解決，於是乎他們不能不「一而倒」，不能不把蘇俄捧上天，不能不把史達林看成萬能的上帝，不能不大量犧牲中國人民的生命以換取史達林的光榮，更不能不以屠殺爲統治全國的最高政策，凡此種種，其病根何一非從一個「陋」字出發？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六日，美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投在日本的廣島；同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又落在日本的長崎；日本乃坦率承認科學失敗，無條件投降，毛澤東有了這次韓戰的經驗，我不知道他是否還相信「幾條爛鎗，可以同日本人打，就可以同美國人打？」



是否「陋」到連科學也不承認？

我回到重慶以後，曾經把我五天在延安的一切見聞都向朋友們談了，我尤其強調兩點：第一、他們軍人的質素要比文人的來得好，依於組織的力量，軍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領導，決不是假的；第二、他們的黨員和公務員的生活，相當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們沒有脫離羣衆。我在當時的重慶一定要說出這個話，雖是有爲而發，但確實也是當時當地中共所表現的事實。就到今天，我也還是相信：軍人萬能，不僅不會有所謂自由民主，壓根兒也不會有所謂政治；從事黨，政工作的人員，如果不能結束奢侈與浪漫的生活，中國更不會有實現清明政治的可能。



# 十 勝利以後

(我所見國共最後破裂的一幕)

日本雖是在兩顆原子彈投下以後即表示無條件投降，可是正式向盟軍簽定降書，却是在三十四年九月二日於停泊東京灣的米蘇里艦上舉行的，而岡村寧次代表日本向中國代表受降的何應欽氏簽定降書，則是同月九日在南京的事。

中共的目的，原來就是要藉抗戰以求生存，以求擴大實力，以至做到水到渠成，能够代國民黨而起，以掌握中國的政權。他們的出發點及其最後的企圖既是如此，因此在八年的抗戰期間，雖然在表面上好像是要做到對外一致，但精神上却終於沒有融洽無間的可能，而且會不斷的發生過若干或大或小的磨擦。在抗戰中，國共兩黨即正式破裂，這無異給予敵人一個更好的機會；在勝利後，國共無法協調，也必然召致國家分裂而且有使蘇俄坐收漁人之利

的可能；這個形勢是當時一部分留心中國政情的人所看得非常明瞭的。爲了要避免這樣一個不祥的趨勢，於是有不少的中外人士，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奔走調停於國共之間，其目的無非想爲戰後的中國，求得一個小康之局，以消弭世界的隱患。可是這一切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尤其以馬歇爾特使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來到中國，專爲此事在中國滯留一年以上，迄三十六年一月返美而一無成就，所受的刺激爲最大，而影響於此後美國對華政策者也最深。

爲了對日受降的問題，國共間所發生的爭執，已幾於無法妥協，可是三十四年的八月底，毛澤東居然接受了蔣先生的電邀而有重慶之行，却會給予人們一度新的希望。當其迎毛的飛機已在重慶出發以後，我接到雷傲寰（震）一個電話：

「怎麼樣？你的提議已實行了啊？」

「什麼提議？」

「就是約毛澤東到重慶來當面談談，你看到底來不來？」

「什麼人去接他的？」

「赫爾利大使和張治中。」

「他對我說是可以來的，既加上美國的保護，我想更無不來之理吧！」

當毛澤東抵達重慶的這一天（我記得是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其他的五位參政員，因為在延安受過他熱烈的歡迎，也趕到機場去接他，這一天，他穿了一身新衣，連帽子也是新的，下機以後，分別與歡迎者一一握手，國民黨的要人們，除邵力子外，似乎沒有其他可注意的人到場，我已感到空氣並不怎樣良好；而且覺得國民黨要在這些不重要的地方表示優越感，也大可不必。

毛初到重慶的一星期，我除參加過兩度公式的宴會以外，完全不知道國共直接交涉的內容是什麼，大概到了第八天或第九天，邵力子乃把中共所提的要求種種，全盤告訴了我們的朋友周謙沖，我們才知道中共的具體條件是保留四十八師軍隊，要取得五省主席，四省副主席，四個副市長，再加上一個北平綏靖主任。而國民黨一方面的方針却是「中樞可讓，地方不讓，政治可讓，軍事不讓。」我知道兩方面的距離太遠，決不能有所成就，因此在去延安的六參政員請毛周吃飯的那一晚，我便向周恩來說明，要他勸毛早回延安，久留也決無結果，而且難保不夜長夢多。可是毛在重慶依然留了四十幾天，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才回到延安去。

這次國共會談的結果，依然發表了一個「會談紀錄」，此即後來「政治協商會議」之所

由來。我因為覺得毛直接來談且談不好，再協商也無多大意義，因此對「政協」謝絕參加，到了三十五年的一月，我便攜帶家小回到上海去了。我之所以急於要回上海，主要的原因是為青年黨籌備復員，在京滬一帶不能不事先有一番布置，經我和周謙沖劉東巖三人在上海南京一帶奔走接洽半年的結果，總算找好了十來處房子，創辦了一個「中華時報」，一個「人文研究所」，抗戰以後的青年黨還能畧具規模，與這一幕是有相當關係的。其時青年黨的中央黨部還留在重慶，關於出席政協會議，參加第四屆第二次參政會，以及決定參加政府的人選種種，我大抵都沒有直接與聞，連把我擱在政府裏面參加一名部長，也是山黨的中央決定的。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終於無法妥協，最後一定要以兵戎相見，打一個你死我活，這在我看來，幾乎是命定的，聽憑你如何熱心團結，統一，如何舌口婆心調停奔走於兩者之間，如何以公平合理的態度去爭取兩方的互讓，其結果總是徒勞無益。這樣一個趨勢，我在抗戰一開始，即早已看得明白。記得有一次，我和梁漱溟還有其他的幾位，在重慶一個朋友的家裏談天，漱溟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強調他平日一貫如何如何求得和平統一的種種說法，我實在有些忍耐不住，記得我當時曾說過：「希望國共兩黨坐在一張桌子上來共同處理

國家的政治，這實在是我所不能想像的事！我們越是怕內戰，內戰便越是不能避免也不一定，我們要爭取戰後的和平統一，似乎應該別求所以自立之道，單從「怕內戰」這一點出發，是不會有什麼用處的。」漱溟這個人很認真，在他的立場上，也確實有一種誠意，因此他極不以我的話爲然，甚至於他誤會了我的話，以爲所謂不怕內戰，即無異於提倡內戰。其實我的看法從理論上說來似乎很簡單，從事實上說來却不是不正確：第一，國共兩黨間積怨太深，到底無法消釋；第二，兩方面對政權都有一種獨佔心理，有國無共，有共無國，彼此所見是沒有區別的；第三，雙方都迷信武力萬能，而各有其優越感，但國民黨發揮優越感是陽性的，共產黨發揮優越感是陰性的，因此共產黨更容易博得一般淺薄者的同情，而國民黨更容易上共產黨的當；第四，共產黨是一個國際性的黨，不能不受國際共產集團的拘束，演變到某一階段，它便只能以其集團的利害爲利害，決不能以國家民族的利害爲利害，如此而希望國共合作到底，豈非笑話？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之下，以我的理想，最好是除國共以外，能更有一個像樣子的大黨產生。俾於國共兩黨之間，能發生一種制衡作用，對於防止該兩黨之各走極端，未嘗不可以有相當作用。當時的青年黨與民社黨之不足以勝此重任，是我所知道的，因此乃不能不寄其希望於「民主同盟」。國民黨對「民盟」的態度是始而懷疑，繼而冷淡

；中共則表面加以敷衍，而內心則希望其逐漸演變，完全成爲他們的一種工具；其不願意真正有一個制衡力量可以左右於二者之間，可以說國共兩方是大體一致。不久因爲救國會的分子逐漸加進了民盟，僞裝的中共分子混進來的也有少數，其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強，青民兩黨便當然只好退出。後來張表方梁漱溟章伯鈞張東蓀等雖依然想以第三者自居，但精神上已經不是那末一回事了。

運用「民盟」以防止國共之各走極端，這一幕我算是失敗了，但在抗戰未結束以前，總還要保持一個表面的一致，不要即刻鬧出笑話，我却依然隨時隨事加以注意。例如：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第一次大會決定在舊金山開會，事前由美、英、中、蘇四國，向四十六個會員國家發出請柬。關於外交活動，國民黨非萬不得已，自來是不樂意有黨外的人參加的，但這一次却相當的難處：因爲抗戰是各黨各派一致執行的，現在勝利已快要接近，中國在國際上已取得了一個四強之一的崇高地位，忽然說把各黨各派一律拋開，不論對內對外，總有點講不過去，因此乃有青民兩黨和中共各派代表一人的傳說。不久，我們果然得到政府的通知，即決定以李璜當代表，謝澄平任秘書。其時張君勱原已在美國，大概在三月底，我接了他一個電報，說他已得了政府的通知，請他担任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之一。可是中



共方面究竟如何，却沒有看見下文。有一天，熊天翼（式輝，其時他任設計局局長）爲這件事約我去談，我才知道政府對於派中共代表出席一點，還沒有作最後決定，其時已是四月初，隔代表出發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熊對我說，政府方面總覺得中共的代表出去以後，一定要向國際作種種歪曲事實的宣傳，對政府實在不利。我說：「不錯，他們要宣傳是一定的，可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要他們去了，他們宣傳的作用小，不要他們去，他們宣傳的作用大，而且在這個勝利快要接近的時候，因爲這樣一個問題，把我們內部不能統一的情形，提前向世界公告，實在太不值得。」熊聽了我的話，仍然表示猶豫。我覺得我的話已經說完，便拿着帽子告辭，站着對他說：「假定政府一定不許中共的代表出席，請將我們所提的李璜撤銷，同時我準備把這次的經過電告君勳，請他自決！」熊看見我表示得這樣決絕，又拉着我再談，我便把我的理由，重復申述了一遍，不到兩天，以董必武爲中共代表的明令，才隨同其他各代表作一次發表了。這件事，我只是斟酌當時的情勢，本着團結抗日一貫的立場，覺得應該如此做，便如此做了，原沒有絲毫要見好於中共的意思，可是不到兩天，在某處有一次集會，王若飛却把這件事提出，特別恭維了我一番，我聽了反而好笑。中共的代表是有了，但他們覺得青民兩黨同樣只有一名，不足以示優異，還要繼續爭取名額，一直到四月六日

，即臨走的前一晚十二點以後，王若飛還拉着沈鈞儒到我所住的信義街三十九號來，一定要我陪同他們去找李璜，想把李拉住不放，以便和他們一道以去就力爭，我知道這是中共又在發揮他們這種得步進步的劣根性，更難保不是「民盟」也想參加一份，我內心實在厭惡已極，只好斷然加以拒絕。四月七日，宋子文以首席代表的資格，偕代表團由重慶飛美，董必武畢竟沒有同去，聽說後來還是多爭了一名秘書一名醫生才坐下一班的飛機走的。

上面已提到我之拒絕參加政協，便是因爲我已知道和中共交涉斷然無望，內戰終於無可避免。可是等到三十五年的十月，其時馬歇爾的調停工作已完全失敗。（他是三十六年一月八日回國的）國民大會的召開已無法久延，而國共的武力衝突已如箭在弦上，於是第三方面的人士，包括青年黨，民社黨，民主同盟和社會賢達，又在上海有所集議，我的基本觀念雖然沒有改變，但這一幕我却是參加了的。其時梁漱溟任「民盟」的秘書長，他對這一幕的最後努力，更異常熱心，而且他也似乎覺得他的地位非常重要，其實梁漱溟的頭腦長於分析而短於綜合，他於一件件孤立的事實看得很仔細，而對於一個大體的趨勢却看不明白。當時的大勢是：一、國共終無妥協的可能；二、中共根本不要民主；三、中共根本討厭如國民大會的這樣一個組織；四、即令中共勉強參加了國大，參加了政府，國共的武力衝突也還是遲早要

爆發；五、其時的『民盟』除極少數人還想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以外，大體上却早已偏向中共，喪失了第三者的資格，這些都是澈溪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我的看法如此，但何以我對這一幕又終於參加了呢？老實說：我並不相信國大召開憲法公佈就可實現民主，但我相信要使民主有逐漸進步的可能，必須把黨治從法律上與事實上告一結束；初步實行民主，其幼稚也許比專制還要可怕，還要更沒有效率，但我們無法避免這樣一個階段；依照當時的情勢，也許第一步的所謂民主，根本便是假的，但只要大家知道對假民主有所指摘，便不怕真民主不會降臨。照中共當時所提出的一切一切，包括毛澤東在重慶的要求，三人小組之所規定，以及政協的五項結果，實際無非是爲中共奪取整個政權預留地步，所爭的只是武裝衝突爆發的遲早，絕對無法得着一個永久和平。我深深的感到，與其讓中共永遠是這樣糾纏不清，還不如操刀一割，讓中共代表撤回延安，未來軍事衝突的結果如何，自然是不可知，但政治的做法却確實已經到了水盡山窮，不能不冒險實行這一着。

要敘述三十五年十月最後調停的這一幕，有幾個日子我們必須特別提出。

第一、政府規定國大召集的日期爲十一月十二日，中共認爲這是由國民黨片面決定的，曾提過書面的抗議。

第二、其時在國外並沒有停止用兵，政府且於十月十一日攻下了中共所佔據的張家口。  
第三、第三方面的人到達南京，是十月二十一日，蔣先生除當我們到達的時候見過一面以外，便於同日飛往台灣去了。政府軍且於二十五日攻下了安東。

政府要把國大開成，但各黨派的名單並未提出，假定各黨派都不來，而由國民黨一黨唱獨腳戲，在政治上不能不說是一種失敗；中共對國大是斷然不參加的，但它如果不多爭取同路者，它也將完全陷於孤立；就基於這兩方面都有爭取第三者的必要，因此所謂第三方面才取得了作最後一次調停的資格。

在我們未到南京以前，吳鐵城、邵力子、雷震三位，原在上海做過許多的工夫，我們談話的地點，一處是海格路吳鐵城的住宅，一處是馬斯南路周恩來的辦事處。經過種種的說法，好容易才決定於二十一日約同周恩來同去南京。

我們在南京集會的地點是交通銀行，與中共接洽在梅園新村，與政府接洽則在孫科的住宅。我們經過多度的商討，決定了三條解決的辦法，其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一、雙方各就現地即日停戰，關於停戰之執行，及恢復交通，由軍調部及其執行小組，依照軍事三人小組已有之協議處理之。雙方軍隊應依軍隊整編統編方案辦理。其駐地分配問

題，由三人小組協議定之。

二、全國地方政權問題，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依據政協決議和平建國綱領之規定解決之。其有爭執之地方，並依軍民分治之原則，儘先解決。

三、依據政協決議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綜合小組，商決政府改組問題，一致參加政府；並商決關於國大問題，一致參加國大。同時，儘速召開憲草審議委員會，完成憲草修正案。

我們爲什麼要這樣決定，如果要就已往交涉經過及當時事實加以充分說明，便非再耗費三五千字不可，只好省畧。據我看，就是這樣三條，已經不是中共所能接受，即令當時不即刻破裂，等到在三人小組討論駐地分配問題，國民政府委員會討論地方政權問題，或政協綜合小組討論政府改組和國大問題的時候，他們要找一個破裂的口實，那是太容易也沒有了。梁漱溟覺得在東北關於軍隊駐地的分配以及地方政權的解決，更容易引起爭論，與其把這個責任纔給三人小組和國府委員會去負，反不如把前面三條辦法改得更具體一點的好。大家覺得他的話也對，又以爲莫德惠是東北人，對東北情形特別熟悉，黃炎培平日對這類技術問題他頗能考慮，因此便推定莫梁黃三位先加以研究，再提交大家來解決。他們三位商量的結果得了兩點具體的意見：一、指定齊齊哈爾，北安，佳木斯三處爲中共駐軍地點；二、沿東

北鐵路四十一縣，當時有二十縣在中共手裏，請他們和平交出，由政府派縣長隨帶警察前往接收。大家無異議的贊成把這兩點歸併到前舉的三條辦法以內，由大家一致簽名，然後繕清三份，以一份交政府，一份交中共，一份交馬歇爾特使，他們兩方面能接受自然很好，不能接受，也只好聽便，我們決不再管了。當這個文件簽好了名還未送出以前，沈鈞儒張申府等忽然又要求把他們的名字塗去，這當然是因為他們把辦法的內容事前通知了中共，中共不贊成，而且他們受了中共的責備，因此才鬧出這樣一幕出爾反爾的醜劇。可是我們並沒有因為少數人退出變更我們的進程序，這三份繕清的文件，依然推人分別照送。

中共這一份，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位送去的。周恩來本來早已知道了這三條辦法的內容，因此他事前便已編好了一幕戲，準備演給他們這三位老實人看。當梁漱溟拿着這份文件在手裏向周解釋到第二條的時候，周即以手阻梁，大哭大鬧的對他們說：「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怎麼國民黨逼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對你們破裂。十年交情，從此算完，今天你們就是我們的敵人！」（這完全像在舞台上背誦唸熟的台辭。）這樣一來，弄得他們三位手足無措，於是莫李提議，把這三份文件一律收回，而且即刻由莫李黃羅四位，（黃炎培羅隆基最初原不在場，因為周表演了這

一幕才臨時找來圓場的。)分別向孫科和馬歇爾處將另外兩份取到，交周過目，聲明作廢，於是周才收淚息怒，一幕滑稽戲也就算是閉幕了。據說周青年時在南開中學演話劇的時候，他原是扮丑角的，這若干年來，他隨時隨地都能保持一種戲劇性的作風，做工確實不壞，扮相也不太差，所可惜者，整個的國家，便在他們這種兒戲的方式下毀滅無餘，周也不能不算

是應負責任的一人啊！

自經過了這一幕以後，我便決定使青年黨參加國大，名單也隨即送出，因為我們既根本無法與共產黨合作，便只剩下這一條路可走，走得通固然要走，走不通也還是不能不走的。國大開會以後，馬歇爾是三十六年一月回國的，中共却延到三月八日才正式撤退，從此以後，國共關係便完全進入一種戰爭狀態，截至今天為止，究竟最後的勝敗誰屬，依然還是一個未定的問題，大概只好隨着整個國際問題的解決以求得最後的結論了。





# 十一 我眼中的中國農林事業

(畧記我從事農林行政的一點經歷)

關於青年黨參加政府的一幕，大概在三十五年的夏天，國青兩黨的中央，便已在重慶有所接洽，最初所擬議的，國府委員會由我們參加四席，行政院則由我們任一部一政委。我們的中央，大概覺得我這個人不大宜於坐而論道，因此沒有把我擺在國府委員會，而要我担任行政院的一部，當時據說有兩部聽我們選擇，一部是農林，一部是水利。因此我們的中央便有借給我，問我願幹那一部。我的回答是農林。等到三十六年春天，政府的改組快要成爲事實的時候，我們在行政院的一部一政委，已變成了兩部兩政委，而可以聽我們選擇的，則有農林，水利，經濟，郵電四部。（郵電一部擬由交通部劃出。）我自己依然願意幹農林，其餘的一部我便主張幹水利。我這個用意是很簡單的：第一，像農林水利這類的事業，在一個

現代的國家，本來是頭等重要，但在中國却還沒有人懂得重視，因此機構既簡單，預算也很小，人棄我取，可以減少若干人事上的糾紛。第二，這類機構的技術性都很重，非有專門素養的人幹不來，關於人員的進退，有一定的標準，因此在我們內部人事上的安排，也比較容易。第三，農林水利這兩部的關聯性很大，都幹得好自然可以相得益彰，幹不好也還可以截長補短，相互補救。第四，這兩部在表面上雖然都是冷淡部門，但出席行政院會議的發言權都是一樣，關於其他的重大問題，假定我們有真知灼見，並不怕沒有貢獻的機會。此外還有一點，是我在當時不會說過的，即我在青年時期對於宋教仁先生是相當崇拜的，不幸他在三十二歲的時候，即爲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這班奸人合謀所暗殺，他曾任過唐紹儀內閣的一任農林總長，而在第一屆國會內多數黨領袖的資格被犧牲。我當時在一張上海報紙上，看見他被刺後的照片，心裏非常憤慨，現在我既有參加政府的機會，所以也想來幹幹農林，假定我對「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這一課題，能够多少做出一點成績，也算是我對宋先生表示一種敬意。宋是我的同鄉，也是我的前輩，我就富有這種封建思想，而且還想保持這種封建思想。

不幸我上面所舉的因循理由，並沒有被青年黨的中央採納，結果還是決定除農林部另參

加經濟一部。最初黨方的決定，本是要李璜担任的，而且已經明令發表，李也準備就職，但卒以內部人事上不容易應付，他才知難而退，而把這一席讓給了陳啓天。最近香港一張報紙上，有關於這件事的記載，說李是「薄而不爲」，這倒不是事實。

我到農林部接事是三十六年的四月，事前我的前任周貽春，對我把部裏邊的情況談過兩次，原有兩位在部裏服務的青年黨同志，更給了我一番詳細的說明，因此我對部內各方面的情形，已大致有了一個輪廓。接事後經過了半個月的時間，我自己便已內定了四點辦法：一、原有部內及各附屬機關的專家或技術人員，一切照常，決不輕予更動；二、工作進度：須以實地視察爲準，我不能完全相信書面的例行報告；三、除原有確定的預算照常經由會計處會同總務司的出納科支付以外，凡一切臨時興作須用錢者，即召集有關方面協商，仍按會計手續辦理，畧採重點主義，亦不願其過度偏枯；四、凡部內各司及各附屬機關的相關事項，例如糧食增產，即召集各首長開會解決。

部內原有農業、林業、畜牧、漁業、墾殖、農業經濟、總務七個司，每一司的職員，大率十餘人或多至數十人不等，除總務司的職務原在處理部內一切普通事務以外，我覺得其餘的各司却應該側重業務的推進，而不應該耗費太多的時間於例行公事的處理。我以爲必須有

了像樣子的業務，然後紙片上的工作才不可少，否則徒有一堆紙片，可以說是半點的價值也沒有。

農林部的精華不在部內，而在其所屬的若干附屬機構。在南京的主要附屬機構計有七處：  
一、中央農業實驗所，二、中央畜牧實驗所，三、中央林業實驗所，四、農業推廣委員會，五、棉產改進處，六、菸草改進處，七、農業經濟研究所，這些機構均各有其預算，各有其職工，亦各有其所附屬機構，農林部僅處於行政領導的地位。在我在職的一年零八個月期間，我對這些機構曾隨時前往視察，不斷予以鼓勵，凡他們在設備上，建築上，經費上，所遭遇的困難，也會用過種種方法為他們解除。主持這些機構的首長和若干高級職員，多數是美國留學生，其次亦國內各大學農科或農業專門畢業的，曾在日本學農的也有一部分。他們的待遇都很菲薄，但他們對研究和事業的興趣却很濃厚。每當我視察一個機構的時候，往往要花去幾個鐘頭，有必要時，我還要請他們為我詳細講解，以補充自己的常識，我所最注意的，乃在水利與肥料對於增產的關係，優良品種推廣對於一般農民經濟改善的可能，農業機械運用對於目前中國農村的限度，防止病蟲害與獸疫一切藥械的利用對於農產畜產的效能，各類農產品對於國家整個經濟體系上所應該發揮的功用，……據我觀察，中國農業的現代

化，已正在發端，假定能有十年的安定，繼以不斷的努力，更加上若干國際的協助，即不難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但最主要的關鍵，仍在政府對發展農業的重要性，確有相當的認識。過去中國的輿論，曾有過一度重農或重工之爭，少數日本人，也曾發過「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狂論，其實自我觀之，這些話都是多餘的；一個國家的工業，發展到相當的高度，則農業高度的現代化實為不可能，因為若干農業上研究與實用的機械，以及化學肥料的製造，發電與水利的完成，均非仰給於高度工業的產品不可；同時一個國家的農業如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有無數的輕重工業亦將遭遇莫大的困難，因為不少的原料，例如棉花、橡膠、木材、皮革、毛羽、蠶絲等等，必須有賴於農業方面的源源供給也。今後我們的旨趣，只在齊頭並進，分工合作，孰輕孰重的說法，根本是用不着的。

農林部散在全國各地的附屬機構也還不少，但比較可觀的却集中在上海與平津一帶，就我實地視察過的說，例如主持全國蠶絲改進的蠶絲公司（在上海），及其所屬的研究機構，育種場，綢織廠，桑園苗圃等等，均已規模畧具，內容相當堅實，且能充分的自給自足，不必仰賴政府。其次水產實驗所，雖是一個新興的機構，但進步很快，主要的建築已大體完成，一部分的設備，得聯總的助力不少。其次病蟲藥械廠，總廠在上海，分廠在北平，所製各

種防止蚊蟲的藥械，已逐漸推廣及於全國。又其次水產公司，這是一個以捕魚爲主要業務的營業機構，但有一個設備相當完善工作效率也相當高的網廠，頗值得重視。此外農林部在上海設了一個通訊處，實際則是處理聯總送給中國若干農業物資的一個機構。這方面的工作，在我的前任手裏已經處理了大部分，在我接事以後，也還陸續來了若干零星的物資，當農林部收到這些物資以後，即分配於全國若干申請需要這些東西的機構，並包括全國若干農業教育機關。我對聯總這個機關的組織，及各類物資的分配與運用，自來是不滿意的，但在我到農林部以後，我才大體明白這個裏面的情形是何等的複雜！現在事過境遷，我也不願繼續對這件事有所指摘，可是我却因此得了一深刻的教訓：今後無論是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國際組織，如果對中國某種事業願在實際上加以協助，其可採用的方式，應以兩種爲限：其一，完全以外國人爲主體，參加的中國人僅以提供意見爲主，而不一定強其接受，以代其排除困難爲副，而不參加決策的工作；其成敗得失之責，即由外國人直接負之。其二，由某一國家或國際供給經濟或物資，並得提供原則上的意見，或劃定工作的範圍，必要時亦得幫助解除技術上的困難，但由中國人全權主持，有無成績，亦由中國人負完全責任。最不好的一種方式，即在名義上由中外共同處理，實際則外國人隱操大權，形式上在中國行政系統之中，事實

上則儼然一獨立王國，而超出於中國行政範圍之外，關於人事的進退，工作的考核，待遇的規定，舉非中國政府所得過問，但一經失敗，又往往把責任向中國人身上推，而此類與外國人員合作的中國人：除少數自好之士以外，大率是一類買辦式的人物，平日總以迎合外國人的意旨爲主，其一切措施，不一定合於中國的需要。不獨把事業完全敗壞，且助長中國人一種媚外的惡習，甚至也把外國人帶壞了！不過話仍得說回頭，就我所知道，在農林部範圍以內，所得聯總的助力依然不少，其所分配於農林部的一部分物資，（漁業物資另有漁管處負責，農林部事實上不能過問。）大體上也沒有浪費，這是必得加以說明的。

農林部散布在全國各地的業務，我主張必須隨時加以實地視察，平日除分別派人各就業務加以考察與指導外，我自己也就近在江浙一帶看過不少的地方。三十七年的初冬，我更抽暇去過一次平津，隨同我一陣去的，有技監趙連芳，農業司司長馬葆之，他們兩位着實給了當地工作人員若干技術上的指導。北平的農業實驗所，天津的墾殖公司，以及植棉，防止獸疫與病蟲害等工作，均具有相當基礎，可惜爲經費所限，不能放手擴充。我平日對部內的高級人員常說：「一件事只要我們確實看準了，認爲值得做，我們便應該放手做事，大膽用錢。」可惜中國人對農林事業的重要性尙沒有充分的認識與信賴，我這個希望，也就遠成其爲

書生之見而已。

可是話雖如此，在我任農林部的一年又八個月的期間，下面所舉的若干工作，確已走上了相當的軌道，而且多數已在發展中：

一、我們完成一個全國性的「糧食增產計劃」，部分已付諸實行，成敗互見。

二、若干可以換取外匯的農業物資，如桐油、茶葉、蠶絲、豬鬃等等，均定有獨立發展與整理的計劃，蠶絲因有上海蠶絲公司主持，人事、經濟、技術、設備均有相當基礎，情況頗可樂觀。

三、若干國內的必需品，如棉花、菸草、羊毛、水產、牲畜等，亦均分別推進，棉花的增產與改進，更有顯著成績。棉產改進處建了一座頗具規模的「棉業館」，在我離職前已告落成，且已有了部分的設備。

四、土壤調查與肥料運用，已在積極進行，中央農業實驗所添建了一座「土壤肥料館」，正準備作一種較大規模的研究。各種化肥的實驗，已分別在各地進行。

五、爲了研究中國農業經濟的各種實況，農林部在我任事以前，原已有一個農業經濟研究所的創辦，可是在草創期間，一切都還談不上，甚至連所址也還是租借的一所民房，我覺



得這件事非常重要，因而與該所李所長慶慶籌商，覓地規劃，興建一所可容近百人從事研究工作的所址，當我離職的時候，已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員遷入，我並且想把部內的一個統計處，和中農所一部分「農情報告」的工作也一併歸到該所去，但已來不及實行了。

六、大規模的從事造林，也是中國一件迫不容緩的大事，但過去總是蹉跎復蹉跎的沒有舉辦，農林部有一個中央林業實驗所，我經過一番研究，覺得無論在人才、經濟、設備、規劃的各方面，都太嫌不夠，一再思加以擴充，在首都附近若干小規模的林場，我也曾一再加以觀察，除一二處已有相當成績以外，大抵都無甚可觀，因而我與南京市的沈市長（怡）協商，想由農林部與京市合作，對首都造林這件工作建立一個基礎，可惜我們還只在棲霞山新闢了一個實驗區，在京湯道上種活了不少的法國梧桐，也就來不及做下去了。同時我也向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府提出了一個西湖造林的計劃，雙方已經過初步的協商，亦已不及實現。我之所以着手於首都與西湖造林的意思，並不是爲的塗飾耳目，實在想引起一般大人先生們對於森林的一點興趣，因而我好作進一步的規劃，我知道這是國家百年大計之一，（中國所說的「十年樹木」這句話，實際是不通的。）不給予大家一個學習的機會，事實上是不容易推行的。

七、關於水產研究的工作，在中國真還是幼稚極了，我的前任居然在上海有一個水產實驗所的創建，總算難得。我接事以後，補充了一部分建築，且已正式開門，部分的設備與工作亦已開始，表面的堂皇，幾爲農林部各附屬機關之冠，（但北平的農業實驗所屬於例外。）內容却還是異常的空虛，不只設備上來不及，人才也確實不容易找。該所還有不少的隙地，我很想建立一個新式的「水族館」，最低限度非美金三四十萬元莫辦，也只好留待將來了。

八、聯總送了中國若干套製造農具的機器，原已由聯總在上海建立了一個總廠，並且已選定在若干省區繼續建立，但工作的進行異常遲緩，我因提議在南京設立一個首都農具製造廠，由農林部供給地皮，聯總擔任建築，即把聯總所送的機器運一整套到南京裝置起來。這件事總算得了他們的同意，不到一年的工夫，即已完成。當我離職的時候，已經有了部分的出品。其實這件事只是我對聯總辦事遲緩的一個抗議，沒有想到居然實現，大概連同籌備、建築、及機件的運輸與裝置，聯總要花去近二十萬的美金，現在也許變成中共製造小型武器的工場了。（農林部病蟲藥械製造廠的北平分廠，即代傅作義造過若干的步槍。）

九、在我眼中中央畜牧實驗所的進步，比較是內部設備上的居多，這一方面得着聯總的

助力確實不少，許多重要的儀器，價值數十萬美金，中國自己的財力是辦不到的，在政府的預算上也根本沒有這類的費用。該所有若干優良的乳牛、羊隻、種豬、鷄隻，也大抵得自聯總，在我手裏僅爲該所建立了一所鋼骨洋灰的牛舍，大致可容大小牛隻一百頭以上。關於羊毛的改進，並與上海毛紡織業方面，取得了相當的聯繫。該所在浙江境內開辦了一所飼養優良羊種的分場，已舉行過多次人工授精的實驗。農林部本來在甘肅有一個西北羊毛改進所，工作情況如何，我因爲沒有視察過，很難加以說明。在徐州與上海還有兩處繁殖優良牛種的地方，但上海的成績不好。

十、農林部本身的建築，本來也是很簡陋的，在我離職的半年以前，已感到不大够用，因籌款建了一座辦公大樓，下層有一個可容二三百人開會的大廳，三個醫務室也設在樓下。同時我手裏建了四十八家的職員宿舍。這些建築的落成，大概都在我去職前三個月左右。

上面所舉的這些例子，在我還算是第一次的發表，連在行政院會議，我也從來沒有提出過口頭或書面的報告。我知道，要爲「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至少要化上十年苦幹的工夫；要有十億以上美金可以繼續運用；而且要時局相當安定，至少沒有戰爭；同時還非訓練多數的人才不可；決不是任何一個因陋就簡而且根本不懂得農業如何重要的

政府所能辦得到的。因此我覺得上舉種種，雖然已值得苦幹，究竟還值不得一談。我在去職的前三月，已籌定專款，預備發行兩種月刊：一種「農業行政」，一種「農業研究」，籌備還沒有就緒，已遇着政局的驟變，並此一點宣傳鼓吹的工作，也就成爲泡影了。

總之，我在農林部二十個月的時間，僅僅大致理解了一個重大問題：即「中國農業必如何使之逐漸進入現代化，而爲國民經濟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現在我看見中共這一切胡鬧的行爲，只好苦笑存之，以靜待他們的失敗。好在我們將來對一切一切都須要從頭做起，固不只農業一端而已。

## 十二 結 論

我這個雜記，一共寫了近六萬字，不僅我自己感到相當疲倦，恐怕賜閱的各位，也多少有些厭煩，尤其佔去「新聞天地」這樣多的寶貴篇幅，不能不十分抱歉，因此，我只好在這裏暫與讀者諸君告別。

我是三十八年的四月離開大陸的，承台北若干友人的好意，讓我全家在中華農學會的台灣分會住了四個月，自前年九月來到香港，到現在又經過了二十個月的工夫，除平日偶然寫點文字發表，表示我還存在以外，可以說一無貢獻。眼看世界的劇變，已一天迫近一天，今後茫茫天地，究竟稅駕何所？乃至像我這樣一種雜記，是否還有機會讓我再寫一個續編？這却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了。（中華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五日香港）



## 附錄 清民之際的長沙

（『近三十年見聞雜記』的一個補篇，記述我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經歷）

### （一）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燕翮思遠翥。荏苒歲月積，此心稍已去，  
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經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  
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陶潛

我生在甲午中日戰爭前一年，即清光緒十九年癸巳。從癸巳到辛亥革命，剛好是整整十八年。在這個清朝最後的十八年，正是中國的多事之秋，也正是我個人由孩提，童稚，而進入青年的時代。

很慚愧，我雖是出生在湖南的長沙，可是當民國二年，即正當我二十歲那年離開湖南以前，我的足跡，卻不會越出長沙一步。

我生長在一個沒落的讀書人家，我是我父母的幼子，長次兩兄和四位姐姐的愛弟，同時我自己還是兩個妹妹的哥哥。雖然在那樣一個食指浩繁時處匱乏的家庭，可是我並沒有失去我在家庭中優越的地位，而且還是命定的非要我讀書不可。

在清末，湖南算是辦理新教育最有成績的省分之一，其原因我是後來才知道的。在我離開我的故鄉以前，我在長沙整整受過十年的學校教育；由我自身所體驗，由我後來所比較，我對那些直接教育過我的先生們，那些在長沙提倡或主持教育的人物，乃至那些與教育事業有關的政府機構，我至今還是感念不忘。從這一個極小的觀點出發，我實在看不出最近的四十年，中國的教育，在精神上有什麼顯著的進步。

這個時候，長沙的私塾還不少，有許多守舊的家庭，還不願送子弟進學校，同時小學校的數目，也太不足供學齡兒童的需要，我是十一歲才進小學的，名稱是「長沙官立第十八國民小學」。同學只有一班，約在五六十人左右。年齡大的到了十六七歲，也有小到八九歲的，我是介乎不大不小之間。老師一共是三個，一個教經學的姓羅，一個教國文和算學的姓鄧



，還有一位教圖畫，習字，體操，音樂的姓徐。我在這裏讀過孝經和論語，老師雖然講解，但我依然不大明白，也不感興趣。國文教科書是木刻的，自然一色都是文言。我現在搜索枯腸，在四年中所讀的，總共只記得五句，在某課中有這樣的四句：『我聞紫荊樹，同根同榮枯，一花零落百花壞，東枝憔悴西枝敗』；在另一課的第一句，是『楊氏之園有古松』；每星期作文一次，總是就老師出的題目，胡亂拼湊幾句，最後好像也能寫上兩三百字，但是絕對不通。對於國畫習字體操音樂這幾門，我的興趣和成績都很平平，我惟一的傑作只有算學。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這三位小學的先生都很不錯。以年齡論，羅最長，已近六十，有鬚，身體不怎樣好；鄧次之，四十左右，頸長，額微闊，兩顴稍高，眼有神；他待我很好，曾在暑假中叫一位姓劉的同學和我，向他去補習算學，他在課餘爲他的一個在中學讀書的弟弟講左傳，也許我站在榜邊靜聽；徐先生年最輕，大概只有二十四五，能寫一筆工整而娟秀的字，看功課很認真，性稍嚴，記得一次放學後，我回家太遲，他在路上見着我，曾受過他的責備。羅先生的名字已忘記，鄧字旒仙，徐字定夫。我民國二十六年冬回長沙，知道羅鄧早已去世，只有徐先生還在，在外縣一個中學教書，已經是六十左右的老人了。

這個時候長沙的情況很安定，生活也十分便宜，我記得，我在每天早晨上學以前，總是在母親手裏取四個小錢，可以吃兩根油條，或兩個包子，作爲一頓早餐是足够的。

我在未進小學以前，已經開始看那種木刻的唱本，這類東西以歌謠，彈詞，戲曲爲大宗，印刷紙張都很惡劣，但看起來却也還清楚，價格以頁數計，每一文小錢三頁。進了小學以後，我對這類東西近經過一個『博覽』的時期。我有一個楠木書箱，大概還是我的祖父莘農先生遺留下來的，我記得，我會把他工楷鈔錄的名家八股文多少本，一一搬出，把我所蒐藏的這些唱本子全部放在裏面，簡直是滿滿的一箱。搬出來的八股鈔本，因爲要欣賞我祖父寫的字，也曾翻閱了不少，記得內中有一篇是張之洞做的，我祖父還用硃筆加了不少的濃圈密點，文章是看不懂，但後面有一個批子，我却至今還記得：『披一品衣，抱九仙骨，俯視羣山，皆堪壞矣！』大概其時我已經偶然聽到張之洞這三個字，所以對他這一篇特別注意了。

我從六七歲起便歡喜看戲。我的父親雖然也歡喜我，但他對家裏的事從來不管，因而對於我的行動，也採取絕對的放任主義；母親雖特別關心我讀書，但並不禁止我看戲，每逢我提出要求，她便叫帶我姐姐的一位張奶媽陪我一陣去，這實在是兒童時代一件最快樂的事。等到我能自動看前面說的那類唱本，我對於看戲的興趣便進了一步；再等到我能大規模的看

小說，我便知道了一切劇本的來龍去脈，以及它的穿插剪裁，更感到趣味無窮！凡光宣之交在長沙演湘戲的那班名角，其在當地一般人的心目中，正不下於演京劇的楊小樓，余叔岩，郝壽臣，譚富英，姜妙香以及梅程尚荀四大名旦等等，就到今天，我也還是可以如數家珍的一一列舉其名。

我在國民小學的一時期，除掉看戲以外，還有其他的幾樣課餘工作：其一是看小說，其次是聽說書，又其次是聽講平。

我看小說的過程，也和其他的小孩子大致一樣，最初看的是劍俠戰爭一類，例如「七劍十三俠」，「七俠五義」，「小五義」等等；其次是神怪一類，例如「封神榜」，「西遊記」等等；再其次是帶點偵探性質的，例如「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等；比這再進一步，便對「三國演義」，「兒女英雄傳」，「鏡花緣」，「水滸傳」這類東西，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至於談狐說鬼，言情講愛，而文字又比較深奧一點的，例如「聊齋誌異」，「紅樓夢」，「西廂記」，「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這一類的作品，這是到了高小二年級國文漸漸清順以後才開始去摸索的。（後面的四種雖不是小說，但在當時我却是在當作小說看的。）關於這一方面的工作，我從來沒有從學校的老師們得過任何指點，好

在我却有兩個家庭教師，一位是我的母親，另一位是我伯父的一個女兒，寡居在我們家裏的一位姐姐。我的母親還只能爲我講「三國」，講「說岳」，講「楊家將」，講「今古奇觀」；這位姐姐却能爲我講「紅樓」，講「桃花扇」。她對於一部「紅樓夢」，真可以說是爛熟於胸，其對「紅學」的造詣，即令還趕不上寫「紅樓夢人物論」的王崑崙，至少超過了著「紅樓夢寶藏」的高語罕。不幸我到上海讀書的第二年她便死了，這實在是我精神上的一大打擊。

高興聽說書是我十歲前後開始的事，一直到進了高小才完全停止。我們長沙有一處類似南京夫子廟，上海城隍廟，或北京天橋那樣的地方，便是有名的「火宮殿」（真正的名字是祝融宮）。平常總是演戲的時候居多，一到不演戲的時候便是那班說書者的世界。說書的技術真有好壞，所說的內容也大有高低，普通總有十個八個人同時開講，技術高明的可吸收聽衆到三四百人，太不行的便三五十人也維持不住，所謂技術好，不單是指的口齒清楚，交代明白，在表情上也大有關係，譬如講關公過五關斬六將，不單是要把關公那一股義形於色的神情表現出來，便連他那一口青龍偃月刀，也要用手勢表示得活靈活現，每講到緊要關頭，說書人照例賣一個關子，便開始收錢，多的一次可收入二三百文，少的便幾十文也不容易到

手，這確實是很公道很民主的，擴而大之，便是站在海德公園那班發表競選演說的人們，還不是和這個大同小異？這裏不單是有書聽而已，那戲台下面還有許多在別處絕對吃不到的東西可吃，例如用牛肉或心肺下的米粉，豬蹄子湯麵，色香味樣都好的臭豆腐，我覺得這只有在抗戰期中我在成都吃過的「吳抄手」，「賴湯元」，以及「紅油餃子」，「担担麵」才可以趕得上，但這只可爲知者道，沒有這種經驗的人是不懂的。

聽講平另是一種趣味，其時我的家住在長沙南門外一個半鄉半城的地點，打開大門，便是一望無際的菜園，從門口的左手望去，有二三十棵柳樹，都是三五十年的老樹了。每到夏天，我們坐在門前的竹床上乘涼，或一彎新月從柳梢漸漸升起，二更還不曾打過，正是夜闌人靜的時候，便聽到一派的絃聲，夾着一兩句聲調淒涼的歌唱，從柳林後面穿出。只要我們高喊一聲「講平」，便可看見一個人徐徐走來，胸前抱着一面月琴，左肘下懸着一盞八角玻璃燈，玻璃總是擦得亮亮的，用一根長長的鍊子繫着，一直拖到接近地面。看你要他唱什麼，假定只是短短的一折，例如「三娘教子」，「寶玉哭靈」，或「許仕林祭塔」，便是二十四文，大約二十分鐘便可唱畢。如果要他唱整本的「雷峯塔」，「珍珠衫」，「秦雪梅弔孝」，或「梁山伯祝英台」，便得一百幾十文或兩百文，從二更以前唱起，一直要唱到三更左

右。不純粹是唱，中間也夾着不少的道白。當一個故事發展到頂點的時候，唱的人或發出酸楚的悲哽，或作出歡樂的笑聲，在我一個唸過這些本子的人到沒有什麼，我不知道對我那班姐妹們所起的反應是怎樣，但她們中間有拿出帕子來揩過眼淚的事實，却是我所記得的。

看戲，看小說，聽說書，聽講平，這是我童年時期真正的教育，不管它們的影響是好是壞，但支配我的力量是很大的，也許會從精神上一直支配我到死！

## (二)

一直到十五歲的開始，（光緒三十四年）我才考進了「長邑高等小學」。地點在北門荷花池的濶潭寺，有中學二班，高小兩班，全體同學約一百四五十人。堂長是余子昭（肇升），（大概在第三年，堂長才改稱校長。）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我的親戚，他有好幾個兒子，像余嘯秋，余劍秋，余楠秋，都會留學過東西洋，在社會上頗有名氣，楠秋更是我後來在復旦的同事，這些都是後話，姑且不提。

我一走進這個學校，便感覺得氣象一新，和我那個設在真西山先生祠堂裏面的國民小學

一比，這是何等的偉大。一共有三個操場，外面一個較大的，周圍被四五十株密密匝匝的雜樹環繞着，綠草如茵，是作足球比賽一類的運動用的；裏面有一個較小的，還有一個雨操場，則作爲平日體操之用。關於體育的設備也有一些，例如槓子，平台，木馬，木棒，鑼鈴等等，我對這類的東西不太愛好，也不怎樣討厭，隨班逐隊而已。有四間教室，小學佔兩間，中學佔一間，還有一間是爲中學做物理化學實驗的時候用的。

我們都是寄宿的，宿舍是兩層的樓房，每一間房子住十個八個人不等，情況畧等於長江輪船的房艙。我們每學期繳宿膳雜費二十元，包括制服書籍在內。

我們很不容易看見我們的校長，大概一學期只有三兩次的機會。可是他却常常在學校辦公，不過他的辦公室和我們隔得很遠；因此，我也偶然聽見同學對他有不滿的批評，但現在我回想起來，他實在不失爲一位理想的校長：第一，他能把全校的行政處理得有條有理，無處不覺得整齊嚴肅；第二，在他在職的三年中，（最後一年換了一位姓黃的）從來沒有鬧過一次風潮；第三，我從來沒有看見一位先生上課遲到，或因事因病而不請人代理；第四，尤其有一件事更值得我們感激的，便是他對於聘請教員十分認真。

我們這班的國文教員唐先生（濟渠），我們在背後雖然叫他一聲「唐胖子」，但不是表

不對他不做，毋寧說是對他表示親熱。他能寫一筆何紹基的字，改卷子打批子用的是松煙墨，實在好看極了。我們沒有讀過國文教科書，一直都是古文選讀，每次用油印分發。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讀的便是周敦頤的「愛蓮說」，第二次便是史記「項羽本紀贊」。以後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定，每星期總是講解古文兩篇，一篇長的，一篇短的；或一篇較深，一篇較淺。不過遇着太長的像「李陵答蘇武書」，「報任少卿書」之類，也就只講解一篇。統計八個學期所讀的古文，共有三百篇左右，到畢業的時候我能够背的，有六十二篇，約居全數的五分之一。但背古文並不是先生的強迫，完全是我們自動的。每星期作文一篇，題目大率是史論的一類。我第一學年的作文分數最低是三十九分，最高是六十四分，依然不通。到第二學年開始，做了一篇「周公誅管蔡論」，我把周公切切實實責備了一番，說他並沒有一定要殺這兩個老弟的必要，唐先生居然給了我八十五分，從此我才「一帆風順」。

這個時候依然讀經，在高小四年中所讀的是「詩經」，「書經」，「易經」，「儀禮」。我能欣賞國風，但不够欣賞雅頌；「書經」「易經」有一部分我也歡喜，但討厭「儀禮」。教我們經學的先生是一位姓鄭的秀才，他房裏居然有一部「十三經注疏」。我記得他在第六學期離開我們的時候，還做了一首七律送全班同學，我只記得「桐陰繞屋慧心生」一句，



這是我們自修室前那一排七八棵梧桐的寫實。教史地的是曹秩庸先生，他在「修業」「周南」兩校兼得有課，很有名氣。他教歷史歡喜附帶講一點歷史人物的故事，尤其是咸同故事講得多，實在給了我不少的啓發。

我進高小以後，對算學的興趣依然很高，加上一點淺近的理化和博物，已經使我明白白意識到這些東西很踏實，每上一次課，總能使我知道一點從來所不知道的東西，實在令我歡喜。我相信，假定我在高小畢業以後，依然可以交得起學費，我一定不會誤入歧途，去進那種不要錢的師範，而會一直走到自然科學的方面去。在高小的整整四年中，教我們的算學和理化的，一直是那位中學部的教務主任戴先生（荔生），同時他也兼教中學的物理，他在每次上理化課的時候，總要做實驗給我們看，教法是不錯的。教博物的是一位譚鴻猷先生，他是一位有地位的國畫家，因此他也兼教我們和中學的圖畫。他教博物是自編講義，用鉛字排印的，前面還有一篇序，「鴻猷之於此科，雖云升堂，尚未入室，」便是他那篇序文裏面的警句，現在想起來還是蠻有趣的。至於他在上課的時候，歡喜用各種顏色粉筆，在黑板上畫出各種的動植物，也確實能使我們聽講的人樂而忘倦。我後來對生物學這類的書還不十分害怕，總歡喜涉獵涉獵，也實在受着他的一點影響。

到第四年，我們學校的情形完全變了：余校長走了，換了一位姓黃的，好像是一位舉人。我們不大歡喜他，因此鬧過一次小小的風潮。本來在第六學期，便新來了一位教經學兼監學的曹先生（名惠，字孟其），其時他雖還不到三十，但他已經是長沙的一位名士，古文做得不壞，思想却又很新。當他初來的時候，住的一間房子很小，但是頗新；後來換了一間比較不好却是全校最大的；因此把他的幾十箱藏書全部搬了來。看見他搬書的時候，便把我嚇了一跳：他有那麼多的綫裝書，又有那麼多的洋裝書，真是我以前不會見過的。我記得在他的綫裝書裏面有兩部最大的，一部是『湖南省志』，一部是『湖南文徵』，便佔去了十幾大箱。給我這樣一嚇，我才想法子去和他接近，常常約着幾個同學到他房裏去問長問短，他也實在和易近人，有問必答，就偶然向他借一兩本書，他也只要我們自己登記，按時還他。記得有一次，他桌上放了一都『章譚合鈔』，我便問他：『他們兩位的學問究竟那個好？』『啊！』他回答，『譚嗣同如何趕得上章炳麟！』他又反問我，『你是贊成立憲，還是贊成革命？』其時我腦經裏已經滿儲着康梁思想，像梁啟超那類翻版的『清議報』，『新民叢報』，以及『飲冰室自由書』，『飲冰室詩話』等等，早已涉獵過，因此信口回答：『我贊成立憲』。他張着兩隻小眼睛，用堅決的語氣對我說：『不對！革命好！』從此以後，我才開始

去看鼓吹革命一方面的書，同時在同學合買的書報中，除一份上海的『時報』以外，又加定了一份『民立報』，而且對『先生』，『血兒』，『漁父』等名字，也比『時報』上的『惜誦』，『孤憤』更來得親切了，這大概已經是辛亥年開學以後的事。

另一次，我們又在曹先生房裏談天，看見他桌上放了幾十枚銅元，還有兩塊銀元，我無意中向他發出這樣的問題：『何以錢總是圓的？從前的錢中間有一個眼，現在何以沒有了？』『這個你不懂，』他回答，『這是貨幣學上的問題』。他說了這兩句，便不往下再說，好像很神秘的樣子，我心裏老是不舒服。第二天星期，我便在羣益圖書公司買了一本陳家瓚譯的『貨幣學』，還在集成買了一本康有爲的『金主幣救國論』，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翻看一遍再說，這也就算是對曹先生不肯回答我的問題的一種報復。『康子倦遊於歐美，息轍於檳榔嶼，隱几於南蘭堂，喟然歎曰，……』這是康有爲那本書序文的頭幾句，這位維新派首領那樣一種搖頭幌腦的神氣，至今如在目前，但這已經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曹先生講易經，我便覺得是笑話：他一翻便是好幾十頁，一面翻，一面嘴里還在說：『這個你們不懂，這個你們不懂，』因此，他往往把易經擺在一邊，一直是天馬行空似的講到了正課以外去。記得有一次，他忽然在黑板上寫上了這樣幾句：『大字長宙，方挾萬象而趨

，若驕若馳，而所遇無故物。」他解釋了一番以後，又問我們：「你們看，斯賓塞這幾句話，比起孔子所講的『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怎樣呢？」當時我覺得很新鮮，但心裏依然有些不服：「你憑什麼能同我們講這個，又武斷我們絕對不能懂易經呢？」

有一次，國文教員唐先生告假，曹先生代課，剛好這一天是作文，他所出的題目是：「想像克俄後之頌聲」，我不懂，這是辛亥年的春天，我們這位先生，爲什麼會那樣討俄國呢？

我在高小畢業以後，一直還是注意這位先生的行動。他是葉德譚的學生；他寫的東西，也常常送給王先謙去看；他是譚組安的好朋友，譚在湖南做督軍的時候，他任過他的秘書；他主張絕後，主張不治產；他在章行嚴前期的甲寅雜誌上，發表過不少的筆記，行嚴對我說過：「孟其絕頂聰明，文字寫得好；」他下半生的事業，就辦了一個孤兒院；入民國以後，長沙經過了無數次的變亂，但他還是死死抱着那個孤兒院，鏗而不捨；二十六年我回長沙，首先便到孤兒院去看他，學生是四十四，先生已經是五十五，但他還是興會淋漓，毫無衰態，正在寫一本代表他思想的長篇小說，已經有十幾萬字；他又翻出一本舊稿給我看，後面有奕翊先生一個很長的批子，他說：「我總算對得人起，我在二十五年前，便已經在提倡社會

主義了啊！」他又說：「你今天來得真好，我燉得有牛肉，就在這裏吃飯罷」。

抗戰勝利以後我回到南京，曹先生會寄過他的一本「孟父春秋」給我。這是一本用小說體裁寫成的自傳，約六七萬言，用極美的白話，講極有趣的故事，花了我三四點鐘的時間，一氣把它看完，我對我這位先生，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前年共軍侵入長沙，他不曾走動。他沒有任何產業，依然苦苦守着他那一所孤兒院，大概中共對他也無可奈何；可是到了去年，他畢竟死了，年齡大致是六十六七吧。一個人的生平，最怕不能自成一格，我細考我這位先生的言行，有不少的地方和日本的賀川豐彥有些相似，總算是近代湖南的一位特殊人物了。

### (三)

在宣統二三年之交，（即我在高小三四年級的時候）正是中國立憲革命兩派鬥爭得最劇烈的一个時期，這種情形，也居然反映到了我們的學校，下面的幾個故事，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我的同學中間有一個名易克樸的，平日不算太用功，可是非常聰明，而且辯才無礙。當

我們平日在自修室作功課的時候，他總歡喜一個人在那裏亂唱，後來有幾句，我就聽也聽熟了：『拿鼓板，在長街，高聲大唱，叫一聲，衆同胞，細聽端詳，我中華，原是個，有名大國，……』一直等到我看見了陳天華的『猛回頭』才發覺他唱的原來就是這個。

爭鐵路國有的風潮起來以後，我們湖南也推得有代表到北京去力爭，當時有一位名叫粟鐵時的先生（字默生），乃斷下一個指頭，用血寫了下面的幾句話：『湘路無庸借款，乞中堂主持，鐵時謹上。』我們的代表到了北京，便把這一紙血書，張貼在湖南會館的門口，確給了當時爭路者的一種鼓勵。但中堂指的是什麼人，我便現在也還不大明白。

不記得是在這件事的以前或稍後，有一天，教歷史的曹秩庸先生，在講堂上告訴我們一件事：『今天我在修業學校上課，看見修業的教員徐特立，砍下一個指頭，寫了「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個大字，交給我們的請願代表易宗夔和羅傑了。』當時聽了，我們也非常感動。不久，我還知道羅傑（字峙雲）有一首詩送給徐特立，內中有兩句：『指痕送別壯南八，才氣逼人求李雙』，後來在重慶我和行嚴講起這個故事，他還連連稱讚：『好詩，好詩！』這位徐特立，便是今天中共的五老之一，（其餘四老據說是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謝覺哉）他壯年的時候，在長沙當過多年的教員，後來又到法國留過一時期的學，他也是我在

長沙師範時候的校長，三十四年我到延安，他還和我談過好一會。其人「才氣」是確實有一點，但是讀書太少，只懂得一味好奇喜新，實際中無所主，當初以爲中國一開國會便有辦法，現在大概以爲中國實行共產，便可成爲五強之一，中共的老頭子，已經是如此簡單，青年人自然更不用說了。

梁任公主幹的『國風報』，大概是宣統二年出版的吧。記得有一次，已是晚上十點以後，早已超過了自修的時間，我和一個名此易萬之的同學，正讀着滄江和明水一篇辯論中國究竟會亡不會亡的文字。這篇文章是兩個人共同署名的，明水站在覺得中國非亡不可的一面，滄江則站在力辯決不會亡的一面。兩人一往一復，大概提出了十幾個不同的觀點，往往明水提出的理由愈強，滄江也辯之愈力。當時我們只知道滄江就是梁任公，但我們還不知道明水就是後來討袁一役死在廣州海珠會議的湯覺頓。梁任公在這一篇文章裏，真是把他那一枝常帶感情的健筆，發揮到淋漓盡致，我們兩個青年的熱淚，也就隨着他的筆一直在流。等到我們快要看完，十一點已經過了，齋務姚先生的一付老光眼鏡和兩撇鬍子，忽然在我們的窗前出現：『怎麼還不睡，又在看小說嗎？』我們沒有回答，祇把『國風報』的封面給他瞧了一眼，他看着我們那幅興奮而沉默的神情，也就沒有加以責備，只低低的說了一句：『已

經不早，睡去吧！」便輕移着他的步子在黑暗裏消逝了。

我前面說的那位羅時雲先生（傑），也是當時我們長沙青年崇拜的偶像之一。到了宣統三年，他已經是資政院的議員。有一天，報紙上忽然載着他在北京把辮子剪了，並且還做了一首告別辮子的詩。這件事，我們三個年紀最小的同學，——柳大純，曹應生，舒之璋反映最快，見報後不到兩天，他們也就同時剪了。其時革命的風聲很緊，街上偶然發現剪了辮子的人，頗爲大家所注目；加上校長黃先生，又是很守舊的；於是要把這三個同學開除的消息，乃傳遍全校。我們爲援救他們，乃在就寢以前，把寢室的總門鎖了，第一次召集了一個全班會議。其實開會的形式和辦法都很簡單，不到十分鐘，四十幾條辮子便已全體剪下，無一例外。這樣一來，却把學校當局慌了。第二天午後，長沙勸學所所長左益齋（學謙）便被請到了學校，在教室召集了全班同學講話。益齋穿了一件章絨馬褂，態度很從容，口齒也清楚。他對我們說：「辮子不是可剪不可剪的問題，只是遲剪早剪的問題。羅時雲先生我很佩服，我自己這條辮子也覺得很討厭；聽說你們這班的成績不壞，學校也沒有意思要處罰你們。下學期你們就要畢業，更要加倍用功，不要看見報紙上有什麼消息，就隨便亂動。」聽他這樣一說，我們才知道這場風波已經是輕輕過去。可是長沙起義以後，黃校長依然把他的辮子



盤在頭頂，我們非常憤慨，第三次又用羣衆方式，終於逼着他剪了，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勝利。

我們當時對於革命運動進行的實況，可以說完全不知道，但等到辛亥三月二十九黃花崗一幕出現以後，却給了我們一個絕大的刺激。我們全班同學，原來合資定得有三份上海報紙，民立報，時報，神州日報。其時雖還沒有航空郵寄，就是武昌到長沙的一段火車也還沒有通，可是上海報紙到達長沙，也不過五天光景。上面的三種報紙，對黃花崗一役的經過都記載得很詳細。我們讀了那班烈士們激昂慷慨的供辭，看了方聲洞林覺民陳更新等的遺像，實在是悲憤萬狀。有一天的民立報，畫了一件清廷賞給李準的黃馬褂，上面有團花，每一顆團花便是一顆人頭，尤其給我以很深的印象。當時有一件事我很不明白：清廷之防範革命，不可以說不嚴，但何以這些公然鼓吹革命的書報，既未遭受檢查，也從來沒有聽說不許郵寄，而可以一一聽其到達像我們這樣一個小學生的手裏呢？我想，這決不是由於清廷懂得什麼尊重言論自由，或者只是由於它的懶惰和愚昧。現在的人畢竟是進步多了，他們懂得言論是有力量的，凡一切對他們不利的言論，他們懂得嚴格的去加以取締，甚至加以全面的控制，一如今天中共在中國大陸之所爲。可是假定只懂得『人言可畏』，而不懂得以開明的行動去轉

移輿論，其懶惰與愚昧，究竟低於當日清廷的有多少，總也還是一個大大的疑問吧？

辛亥九月初一，長沙以響應武昌革命宣告獨立了。其時我們正開始準備畢業考試，在這樣一種紛紛擾擾的時局中，我記得我們畢業的考試和典禮，都是相當草率的。有一位平均分數比我多一點的同學楊幹邦考了第一，他後來繼續在長郡中學，高等工業畢了業，便一直在地方服務，是一位有相當地位的工程師，經常在贛山工作，我對他保持着很好的友誼，在抗戰中我還見着他。

我在高小畢業後，還住過半年的長沙縣立師範，一年的外國語專門學校，然後才到上海去讀書。以我家庭當時的經濟情況，在我童年和青年時期能够受着這樣一點教育，實在是太不容易。我記得在宣統二年快要開學的時候，我的母親在一個春寒慄慄的天氣，脫下她的皮服去爲她的愛子換取學費的往事，四十年來，也不知流過我的多少眼淚。現在對於一個我曾經加入過將近三十年，而且爲它賣過無窮氣力的青年黨，決定擺脫我的責任，因爲我完全明白它決不會再有光明的前途。今後我將對「充實自己」多下工夫，凡我認爲不能做或不應該做的事，我決不會去參加；凡我認爲可以做或應該做的，我還有的是我的氣力。